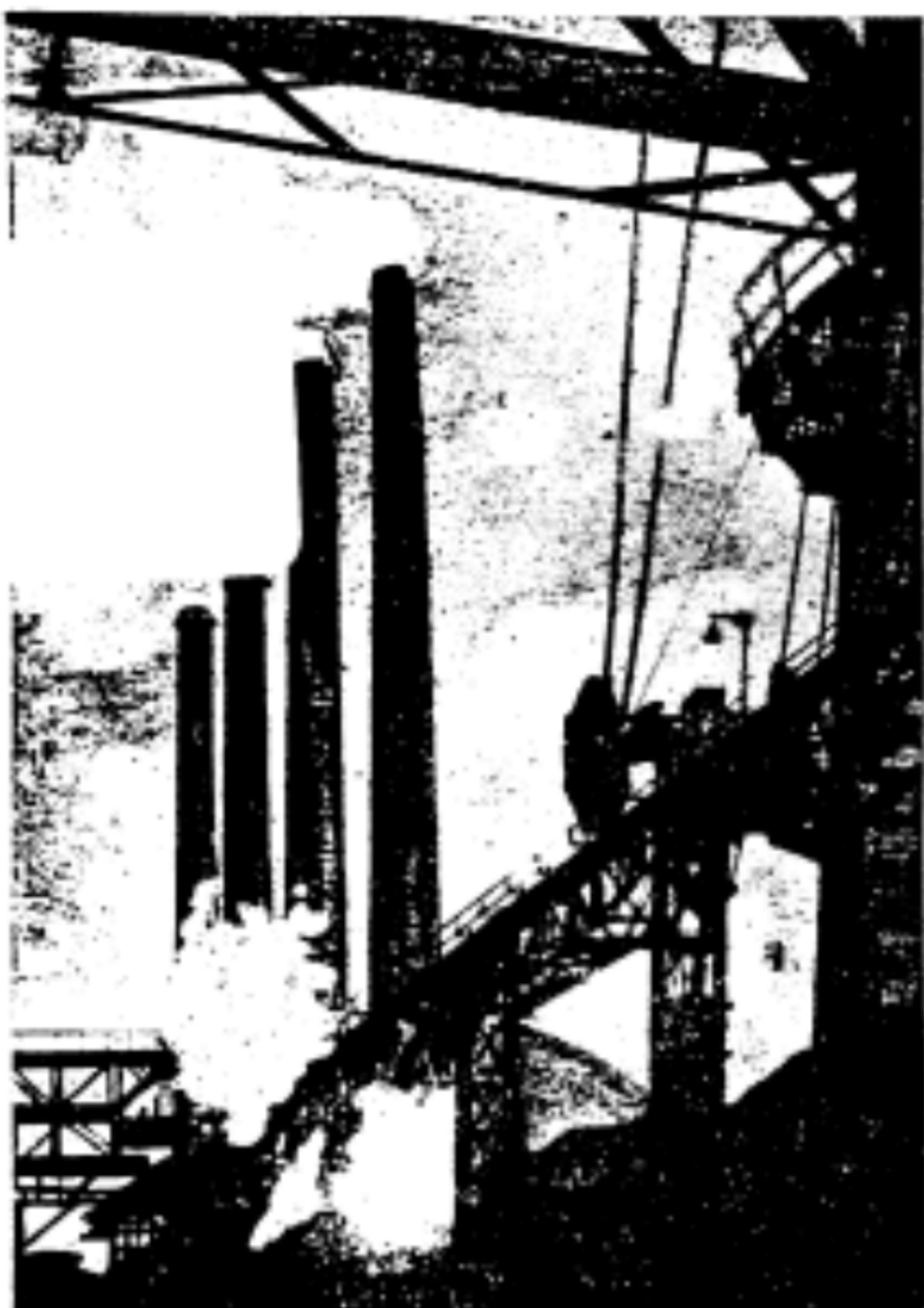


江南素家的出路

許 滌 新 著

新民主出版社發行

著 新 潤 許
路 出 的 家 業 商 工



行 發 社 版 出 主 民 新

工商業家出路

著者 許滌新

發行者 新民主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

承印者 嘉華印刷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定價 港幣一元四角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版

有所權版

0001—5000

目 錄

民族工商業家的出路在那裡？（代序）	一
第一 耕者有其田是發展工商業的前提	二
一 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三
二 並不是實行共產	四
三 保護正當工商業	五
第二 消滅壟斷資本與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	六
一 必須消滅四大家族的壟斷資本	七
二 關於中小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	八
三 新中國的經濟指導方針	九
第三 關於官僚資本的逃遁與變形	一〇

第四 城市經濟的改造.....(一九)

一 蔣區城市經濟的危機.....(一九)

二 蔣區城市危機的因素.....(三三)

三 解放區如何改造城市經濟？.....(三五)

第五 論城市的社會改革.....(四〇)

一 中國城市的社會特點.....(四〇)

二 城市社會改革與農村土地改革的區別.....(四一)

三 依靠生產，依靠從事生產的群衆.....(四二)

四 避免過渡期間的混亂.....(四五)

五 一些疑慮的解釋.....(四八)

第六 新中國在大步前進.....(五一)

一 大變化的一年.....(五一)

二 蔣區經濟陷入總崩潰.....(五三)

三

高漲着生產思潮的解放區

(五八)

(一) 農業生產的提高.....(五八)

(二) 城鄉經濟關係的改善.....(六〇)

(三) 工業生產在前進.....(六一)

(四) 交通的恢復.....(六四)

(五) 幣制的統一.....(六六)

四 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第七 論新中國的工業商家.....(六九)

第八 中國經濟學人今後努力的方向.....(七四)

編後記.....(七八)

民族工商業家的出路在那裏？

——序——

這幾年，特別是最近一年，廣東省和香港的商人，正遭遇着空前的無可比擬的災難。在這種極端的新

的無比的災難中，不但生活沒法繼續下去，並且連個人的人權和財權亦都成爲問題了。

這種災難，是怎樣形成的呢？是誰在把官府逼進泥潭的呢？

很明白，這是南京政府把它製造出來的。

首先，在四大家族官僚資本的壟斷之下，以前李所經營的工商業，早就失去了發展和存在的可能了。四大家族利用槍桿和暴力，假國家資本的名義，進行其壟斷包辦的銀行。你看：所謂國家資本的四行（中、中、交、農）兩局（中信及郵匯）與一庫（中央合作金庫），不是被他們在事實上瓜分了嗎？他們不是各各利用這些國家金融機構去壯大自己的銀行和商行的資金嗎？你看：那些以國家資本的面貌出現的資源委員會的開採，冶煉及化工各單位，那一個不是被他們所瓜分攫取了呢？他們一面把持了國家的金融機構；一面又把持了國家的大規模的工業和貿易機構，形成爲一種窒息一切的國家

壟斷資本主義。他們利用其「經濟」的與「超經濟」的權力，進行各種「合法的」與「非法的」巧取豪奪，施行各種打擊民間工商業的管制政策。在這種情形之下，民間工商業怎能經營下去呢？

可是，南京蔣朝對於這樣的壟斷，還是以爲未足的。在壟斷與管制之外，它們還進行了空前的惡性通貨膨脹。所謂法幣制度就是蔣朝掠奪民間財富的一種行動。在法幣制度之下，人民的白銀完全變成「紙錢」了。經過八年抗戰，幣值跌去了五百餘倍，即是說，人民手中的財產（以法幣表現的）亦被劫持去五百餘倍。抗戰慘勝之後，蔣朝發動內戰，軍費支出，巨量增加，法幣膨脹亦達到使人目瞪口呆的程度。截至今年八月間，法幣發行數量將要達到一千萬億元。人民手中所有用法幣表現的財產，商店中由於賣出商品而收回的法幣，每一秒鐘，每一秒鐘，都在跌價。這種事實不是證明惡性通貨膨脹，乃是蔣朝變相地沒收人民的血汗，和商人的資產的最利害的武器嗎？

法幣跌得不像樣子，於是，他們又搞出一個「金圓券」來。金圓券的發行額，不到三個月，便把二十億圓發行得差不多淨光。以三百萬對一的比率，合法幣六千萬億元。就是說，在三個月之內，金圓券的發行額就超過過去十餘年的發行總額的六倍。金圓券的發行是更大更惡性的通貨膨脹。這種更大惡性的通貨膨脹，又進一步把蔣匪的人民和工商界的財產加以沒收了。

蔣朝可惡的地方，還不僅在於用新紙幣換舊紙幣，還不僅在於更大更快的進行其惡性通貨膨脹，而且在於它的無恥地用牠的不值一文的紙幣強迫人民交出金銀和外幣，強迫人民交出歷年用血汗所凝結的價值。截至最近，由於強迫人民兌換的金銀外幣，差不多快要達到二億美元了。在這一筆財產

中，不知包含了多少血淚與辛酸，不知包含了多少傾家蕩產的慘痛的事實！

對於蔣區內的工商業家，不但被蔣朝強迫交出金銀外幣，而且被蔣朝的經濟「戡亂」，「戡」得連最後的一口氣亦喘不出來。蔣朝的經濟「戡亂」是以工商界為對象的。它把四大家族所做的一切壟斷操縱的罪名，完全算在民間一般工商業家的頭上。「幣制改革」之後，蔣朝就迫不及待的進行下列幾件事，第一項是清查倉庫沒收三個月以上的存貨，第二是以「八一九」的價格作為標準，強迫商家依照這個價格售賣其貨物。查「八一九」的限價，完全是不合理的，「八一九」以後，物價不斷上漲，最高的漲了十倍（如天津）；最低亦漲了五成。物價漲成本高，而蔣朝却不分皂白的壓迫商人維持這個不合理的限價，違背這個不合理的限價而被發覺的，當然沒法避免蔣朝的摧殘。據法國新聞社本月廿四日電訊：「從八月中實施改革幣制到現在，南京市因違反物價管制規定而被捕的人，將近兩千。」上海方面，因違反限價而失去自由，人數亦在不少。用迫害來維持限價，不是證明這種限價與工商界完全矛盾的嗎？第三，蔣朝自己在惡性通貨膨脹，自己在促使金圓券的匯率跌落，但它却以嚴刑酷法去對那些為了保持價值而拋售外匯的商人。王春哲是這樣被槍殺了；榮鴻元和戴家駒（中國信託公司經理）是因為這個罪名而被捕拘了。這種無法無天的做法，除了在法西斯國家以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得出來呢？

蔣朝對於民間工商業家，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但那些與他們有密切關係的人物，却逍遙自在的依然大幹其團積操縱的好事。事實勝於雄辯，看看事實吧！紙業公會理事長詹沛霖被捕的罪狀是團積各

色紙張三千餘件；永泰和烟公司經理黃以聰被捕的罪狀是囤積巨量香煙；錫記布莊老板吳錫麟被捕的罪狀是囤積一批棉布，但是，這些人比起傅作義、閻錫山、宋美齡、劉峙和二陳等等，那是微小到不足道的。傅作義囤積了一萬三千多件的貨物，閻錫山囤積了數千件的貨物，宋美齡孔令侃CC和劉峙所囤積的，更不計其數。試問這些囤積操縱的大老虎，那一個受到一點點影響呢？蔣朝的管制是專為民間工商業家而設的。民間工商業家就是蔣朝吃呑的對象，沒有一口把全國人民與工商業家吃下去，這個反動的統治者是死也不甘心的。

二

在這個反動的黑暗的統治之下，民間工商業家當然是沒法生存的。他們的財產，被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了；他們的貨品，被強迫以限價售出而且變成不值一文的廢紙（金圓券）了；他們在莫須有的罪名之下，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了。這一切，說明：橫在民族工商業家面前的，不僅是生意好做不好做的問題，而且是人權財權是否存在的問題。就是因為如此，所以，不少商家完全走上一種變態的地步了。照一般的情形，人們總是教訓兒子勤儉的，但在蔣朝的無法無天的暴政之下，人們却反過來，寧可叫兒子狂嫖濫賭了。本港文匯報九月十七日載有某商人在獄中寄其子的一封信說：

「我一生克勤克儉，只落得這般的地步，願汝等毋效我，速貨我物，物盡，貨吾店，得錢則恣情浪費，我所不爲者，汝等一一爲之，我不特無怒，且以汝等之善用爲可嘉焉。」

為什麼要叫自己的兒子快賣房破產，恣情享樂？這不是「寧可自己用盡，不給蔣朝搶去」的結論麼？一個統治者到了人民不能在牠的統治之下活下去的時候，到了人民怨恨到發生變態的時候，你看，這能支持得下去麼？事實的發展，還不僅是一二個人的變態恣樂，而且成爲風靡一時的風氣了。上海、廣州各地商家所流行的三光政策（即吃光用光賣光）與老百姓爭先恐後的搶購風潮，難道不是這一種情勢的發展麼？

三

但是，中華民族是不絕望的，今天的中國，除了黑暗反動的蔣管區之外，還有光明的進步的解放區。解放區的一切，是和蔣管區完全兩樣的。蔣管區要民族工商業完全死滅，而解放區則以一切方法使民族工商業能够盡量的發展起來。一個黑暗，一個光明，截然不同的。

解放區的經濟政策的總方針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而在工商業政策上，處處是照顧到民間工商業的。保護民間工商業的根據，是因爲城市的社會改革與農村的土地改革有顯明的區別，解放區民主政府對於民間工商業，不是革命，而是以保證其繼續生產或恢復生產爲任務的。在公私工商業的關係上，今年五月間華北解放區工商業會議上曾經規定：（一）除軍火工業及其有操縱國民經濟或獨占性質與私人所不能經營之工業外，其餘工商業均許私人經營或公私合營。歡迎國民黨統治區工商業家到解放區投資工商業，並給以各種幫助與便利；（二）在物價政策上，公營

商業應指導私商共同穩定物價與扶助生產，反對囤積居奇和投機操縱；（三）公營企業應積極幫助有益於國民經濟的私營工商業，國家銀行應按實際需要與可能，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工商業舉辦貸款；便利私營工商業向外購買必需的原料與工具；公營商店並應供應私營工業以原料器材；公私交通事業的運價應有利於工農商業之發展。在蔣區，官僚資本是在國家資本的名義之下貪婪地吞吃民間工商業的；反之，解放區的公營企業却處處在照顧，在扶持民間工商業，使其有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

在稅制方面，蔣管區，南京政府的捐稅苛雜到不可形容，但解放區的稅制却是簡單的，合理的，輕稅率的，處處注意到培養稅源的，最近華北的工商會議規定合理的征收辦法如下：（一）確定今後對遭受損失過重的地區，工商戶的稅款應予減免；（二）凡屬家庭副業生產性質的手工業及商業經營，一律免征；（三）一般工業稅應輕於商業稅，有些工業並可按其性質予以減免；（四）工商業所得稅採取累進稅制以求公平合理，起征點定為純利冀幣二十萬元，最低稅額為純利百分之五，最高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五）凡不經過市場經紀之交易，一律不征交易稅。這一切，證明了解放區的民主政府是如何在撫養民間工商業之長大啊！

不但華北解放區民主政府提出了這樣具體而週到的保護民間工商業的政策，而且華南游擊區的人民武裝，亦針對着蔣宋政權的殺人越貨的暴行，公佈了保障工商業家和華僑的利益的實施辦法。這證明：在民主政府與人民武力統治下的解放區乃是中國民族工商業家的真正樂園。在蔣管區中備受踐踏的工商業家，只有與民主政府合作，只有與人民解放軍合作，只有在解放區中，才有光明的前途，才

有巨大的發展！

四

擺在眼前的，乃是滅亡與生存的鬥爭。在蔣朝的統治之下，工商業是沒有不關門大吉的；奉行蔣朝的政策，工商業家是沒有不傾家蕩產的。在民主政府的統治之下，工商業是沒有不日昇月盛的；奉行民主政府的政策，工商業家是沒有不欣欣向榮的。黑暗與光明，死滅與發展，道路是劃分得再明白也沒有的了。我們希望蔣匪甚至香港的工商業家，放開眼睛，看看現實；下着決心，走向有利於國家民族和自己的道路吧！

——爲一九四八年商人節而作

二 耕者有其田是發展工商業的前提

一 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中國土地法的公佈，是中國民主運動一件劃時代的大事情，是中國人民解放運動中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在抗戰的時候，爲了團結全民族對日抗戰，爲了團結地主階級對日抗戰，所以我們在那個時候，退一步實行減租減息，緩和地主對農民的剝削，相當的求得農民生活的改善。我們很明白：減租減息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爲它並不能取消那些高壓在農民頭上的封建剝削，並不能澈底的提高農民的生產情緒和生產能力。日本投降以後，局勢顯然不同了。以前所謂「中國的土地屬於日寇抑屬於中國人民」的矛盾，已經不復存在。解放區的人民，奔騰澎湃地起來清算漢奸和惡霸。肅奸和反惡霸運動開展的結果，必然就接觸到土地問題上來。從這個時候起，農民之要求土地，不復只是一種呼聲，而是成爲迫切的行動了。從這個時候起，農民並不滿足於減租減息，而是突破減租減息，走上清算退租，沒收敵僞漢奸的土地及掛地黑地的階段了。

在沒收敵偽及奸惡霸的土地和清算退租以後，農民是部份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除此之外，還有獻地運動和征購土地的辦法。前者是一些黨的幹部和開明地主自動的義舉，他們自動的把土地送給原來耕作的佃戶；後者是卅五年十二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所發佈的「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這個條例規定用土地公債征購地主超過應留數量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這二種辦法都可部份地漸進地推動耕者有其田的實現。不過，這些辦法，無論怎麼樣，總不能澈底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實現這些辦法的結果，農民的負擔雖然減輕了，農民雖然部份地獲得土地了，但地主依然是地主，農民依然是農民，封建剥削依然在農村中統治着，所以最近晉綏日報的社論上說：「去年『五四』指示以來，又只是實現了半個『耕者有其田』還只算翻了半個身」（轉錄自本年十月二十日新華社通訊稿）。

現在土地法公佈了，二千餘年來壓在中國農民頭上的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就會從此被廣大農民的鎗拳所粉碎了。如果從抗戰結束以來的過程來說，現在公佈的土地法是最近二年來各種實現「耕者有其田」的辦法的結束；它打破了二年來那些局部的、漸進的帶着改良性的辦法。在這裡，不免有人懷疑中共對於土地問題改變了態度。我們認為這種懷疑是不合事實的。平均分配土地是實現耕者有其田最徹底的辦法，而實現耕者有其田乃是中共一貫的主張。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早就指出：「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目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時代的正確主張」，並且指出：「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在中國條件下，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把這項主張看得特別認真，

不但口講，而且實做」。由此可見，實現「耕者有其田」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政策，抗日時期不要說，抗日結束以後所採取的辦法無一不是向着這個目標前進的。現在的平分土地澈底廢除封建剝削的辦法，不過是過去二年各種辦法的發展的結果吧了。換句話說，沒有過去二年各種辦法的實施，則今天的土地法之實施，獲不到這廣堅實的條件。

這個澈底平分土地的方針，是廣大農民的正確要求的反映。年來實行土地改革的結果，提高了農民的政治覺悟和信心，特別使僱農貧農認清：「翻半個身」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澈底平分土地，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三十六年九月間全國土地會議所製定的這個土地法大綱，就是根據各地農民的要求而來的。晉綏日報很正確的指出：

「我黨中央的澈底平分土地政策，是今天土地改革運動中的一個總方針。這個方針是完全適合農村中的基本群衆，首先是僱農貧農的根本利益，是反映了和批准了他們澈底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的。實行這個方針就能夠更進一步推動群衆運動之發展為風暴為浪潮，就能夠澈底打垮地主階級，澈底消滅地主階級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就能夠澈底解決土地問題，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把農民從數千年來的封建桎梏下解放出來。」（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日新華社通訊稿。）

二 並不是實行共產

一直到現在，仍有一些人是誤解平均分配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意義的。他們把平均分配土地當

作廢除私有財產，當作實行共產主義。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平均分配土地並不是社會主義的範疇而是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了：

「『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從封建剝削手裏轉到農民手裏，轉為農民的私有財產，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後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張，是一種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主張，並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主張，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張，並不單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論聯合政府）

廢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並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把地主的私產變為農民的私產，這怎能說是一般廢除私產制度呢？土地法大綱第十一條規定「分配給人民的土地，由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並承認其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這不是保證農民的私有財產是什麼呢？第十二條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營業，不受侵犯」，這不是保證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是什麼呢？這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這個革命的一切設施，不是一般地廢除私有財產，而是一般地保護私有財產」。

有一些人是不明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把平均分配土地當作實行共產主義的；有一些人則是故意淆亂「耕者有其田」的社會性質，企圖藉此反對這一運動的，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能不反覆說明。其實，實現耕者有其田，不但不是消滅資本主義性的私有財產，反而甚發展資本主義生產

的必要的條件。

中國工商業之所以年復一年的衰落，主要是由於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失去了購買力。農民之所以失去了購買力，乃是殘酷的封建剝削的結果。這正如中共中央「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上所說：

「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就一般情況來說，佔鄉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農，佔有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殘酷地剝削人民，而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僱農，貧農，中農及其他人民，却總共只有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終年勞動，不得溫飽」。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農民，只有在餓餓疾病中打滾，如何談得到購買力！廣大農民的購買力衰落了，如何談得到有活躍的市場？工商業者所生產所推銷的商品，又如何能找到它們的銷路？

澈底平分土地，澈底廢除封建剝削之後，農民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情緒必然大大提高，農村生產品必然大大增加，這一切都是發展工商業的基礎。有人懷疑平分土地之後，農民所得的土地並不多，並不能維持他們的生活，這是一種過慮的想法。照全國各地耕地的面積和農村勞動人口的對比的材料看來，平均分配每人可能在三畝左右，（就以東南人口稠密之地而言也差不多如此。）五口之家分得十五畝田，又再加以農民自覺的加工施肥，那裏會有不够活的現象？反過來說，難道目前蔣區那種「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足無立錐」的情況，農民反能活得下去麼？很明白，這只是一種反對解放農民的遁詞而已。平均分配土地之後，大家都會有田地，大家都興奮地致力於生產，那其間，農村的生產品必然急

速增加。農村生產的急速增高，必然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列寧曾經指出：小生產不斷地、天天地、時時刻刻地並且大規模地生長出資本主義，就是這個意思。

三 保護正當工商業

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絕不是廢除資本主義的私有權。正相反，正當的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他合法經營是受到民主政府保護的。但在這裏，有二點應該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禍國殃民的官僚資本是必須加以沒收的。官僚資本的發財的秘密，說穿了，只有「刦」、「混」、「騙」、「偷」、「撈」、「洗」六個大字。對着這種「洗刦」的強盜，除了消滅沒收以外，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第二、在農村中，還有前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在活動。高利盤剝的高利貸是一種；而在商業的形式之下實質上進行高利貸的活動的商店又是一種，前一種之為封建剝削是大家都明白的；後一種的超經濟剝削往往不被人注意。這種商業大都是地主富農所經營，平時向其賒貸，他們即利上加利，到年底就把農民的收成抵算了去，對於這種封建性的剝削，當然是不能保護的。

除此之外，從事於製造和開採的民族工業家，從事於交通運輸的民族企業家，從事於商品運銷並且有益於農村生產和民族工業的商家行號都是受到民主政府和廣大農民的保護與支持的。他們的合法

營業及其財產，將受到保護而不受侵犯！

農村經過平均分田之後，日昇月盛的獨立生產者將不相可長成爲工商業的廣大的良好的主顧；而且同時又是工業所必需的原料的大量的供給者。這麼一來，中國的工商業就獲得發展的機會了。因此，平均分田絕對不是對工商業的威脅，而是中國工商業甦生的福音。反過來說，構成工商業的威脅的乃是南京的蔣政府。它們進行內戰，進行三征，造成農村的破產，造成國內市場的崩潰，而其壟斷獨佔，封鎖限制，苛捐什稅以及欺騙搶劫（最近對於自備外匯入口貨物的吞沒，又是一例）等等做法，則是直接欲置中國工商界於死地的！現在的道路很清楚：一條是蔣××的賣國殃民獨佔搶劫的道路，一條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發展工商業的新民主主義的道路。走前一條路則中國的工商業必定淪入死亡的深淵；走後一條路則中國的工商業家將會獲得廣大市場，將會獲得無限發展的機會。我們希望全國工商業界要清晰地認識當前的局勢！

關於華僑的利益，土地法大綱中雖尚未提到，但這個土地法是屬於全國性的，比較原則性的文件，華僑較多的兩廣福建各省的民主政府及農會，將會根據具體情況，訂出適合於當地情況的辦法來。因此，亟望香港及各地僑胞，熱烈起來討論這個土地法大綱，並提出寶貴的意見來！

四 消滅壟斷資本與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

一 必需消滅四大家族的壟斷資本

要挖蔣根，在農村中必須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土地改革；在金融工商業方面，必須消滅那個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在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度中，昇官和發財是聯結在一起的。四大家族及其附庸的官僚資本，就是這樣利用政治權利奪取國家和人民的財富的最標準的例子。蔣××原來雖然出身於鹽商的家庭，但沒有什麼財產，所以在落魄的時候，竟至於在交易所中吃拍板的飯。而今呢？他的家當是沒人能够比擬的了。當宋子文在廣東做財政廳長以前，還不是一名東拉西扯的窮光蛋麼？但是，做了官之後，就成為遠東有名的富翁了。孔陳二家原來雖是經商的，但他們原來的財富如果和現在比較起來，那是微小到不足道的。政學系的幾位財閥，如吳鼎昌、張群、張嘉璈之流又那一個不是從做官弄到財產的？國民黨四大家族及其附庸都是從做官起家，都是從槍桿和政權取得財產的。反過來說，這種獨佔性的官僚資本，如果離開國家政權，那是沒法存在，更談不到發展的了。

國民黨四大家族及其附庸，竊取國家政權，掠奪國家資本。你看：所謂國家資本的四行（中、中、交、農）兩局（中信、郵匯）及一庫（中央合作金庫），不是被他們瓜分了嗎？牠們不是各各利用這些國家金融機關去壯大自己的工商業以至銀行的資金嗎？你看：以國家資本的面目出現的資源委員會的開礦、化工各單位、「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中國石油公司」、「台灣糖公司」及「中國植物油料公司」的各機構，那一個不是掌握在他們的手裡呢？國民黨四大家族，一手搶了國家的金融機關；一手搶了國家的大規模的貿易機構和輕重工業，形成了一種窒息一切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四大家族的這種壟斷資本主義，是「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結合着的」。

國民黨四大家族的壟斷資本是以外國的帝國主義為後台的。抗戰結束以後，四大家族之勾結美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從陸上到海上，從天上到地下，從軍事到經濟，從現在到將來，都應有盡有的包括在裏面。四十多億美元的借款，就是蔣政權出賣中國給美國的一部份價錢。最近又出賣上海電力事業，出賣全國農業主權，企圖使中國成為美國原料的供給地。而美帝國主義呢？除了軍事代表團之外，除了給它美金或黃金之外，並且給它以軍火，給它以棉花糧食，給它以各種各樣的剩餘物資，去打內戰，去發橫財！

四大家族的壟斷資本是和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結合在一起的。四大家族本身是大地主，同時又為

一切地主張目。蔣政權對於解放區裏農民的土地改革當然是極端仇視的，蔣軍在蔣佔區中則用一切殘酷的辦法來鎮壓農民，恢復地主對於土地的佔有和對於農民的罪惡統治。牠們不但利用其政權去徵糧徵兵，利用其金融機關——特別是「中國農民銀行」去資助地主和富農擴大其對於中國貧農和僱農的高利貸剝削，而且明目張胆地在全國範圍內對人民土地實行大規模的軍事性的掠奪和兼併。

四大家族的壟斷資本，就是這樣地充滿着買辦性和封建性的。毛澤東同志說得很明白：

「這個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爲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就是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

四大家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殘酷地掠奪廣大的工人和農民，而且壓迫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蔣政權製造內戰，破壞國內市場；蔣政權的三征政策及一切苛捐雜稅，破壞了廣大人民的購買力；蔣政權的獨佔出入口貿易政策切斷了一切出入口商的生機；蔣政權的惡性通貨膨脹政策普遍地深入地掠劫了一切使用蔣幣的人民的財產；蔣政權的所謂「總動員」和「經濟戡亂」則明目張胆地搶掠一切廠家和商人的存貨。這一切，說明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是與一切人民勢不兩立的，是與中小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互相矛盾的。有四大家族，有官僚資本，就不可能有工農大眾和中小資產階級之存在。只有消滅四大家族的國家壟斷官僚資本，工農大眾和中小資產階級才有生路，才能存在，才能發展！

二 關於中小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

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以消滅這種大官僚資本作為任務之一的。毛澤東同志說：

「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

消滅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壟斷資本主義，並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並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因為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家，而經濟又是很落後的。新民主主義之勝利，奠定了開發中國資源的大前提。在這裡，需要無數從事於製造業的小工業者和企業家，需要無數從事於開採礦產的礦業家，需要無數從事於交通運輸事業的交通企業家，亦需要無數從事於商品運銷並且有益於農村生產和民族工業的行號商號。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麼多的事業需要發展，在一個長期間內，單靠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還是沒法掘發國內的豐富的資源的。它需要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來補助，來合作，來共同建設新中國的經濟。毛澤東同志很明白的指出：

「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

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份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中國土地法大綱」的第十二條，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營業，不受侵犯」。

有人或許會懷疑新民主主義為什麼這樣子的寬容了資本主義，我們的回答是很簡單的。拿發展資本主義（中小資產階級所代表而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何況新民主主義經濟並不單純是資本主義經濟，何況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之下，有着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國家經濟（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走向和合作經營的農業經濟呢？毛澤東同志又明白地說着：

「革命在全國勝利之後，由於新民主主義國家手裡有着從官僚資產階級接收過來的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巨大的國家資本。又有從封建制度解放出來，雖則在一個頗長時間內，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個體的，但是在將來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在這些條件下，這些小的及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其存着及發展，並沒有什麼危險」。

中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不是新民主主義的敵人，而是新民主主義的構成部份之一。備受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壓迫的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只有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才能找到出路，才能生存，才能發展！

三 新中國的經濟指導方針

現在，必須談到新民主主義的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了。毛澤東同志很扼要的把這個方針用十六個字表示出來，這就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貧困的，是殘破的，而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經濟，則是欣欣向榮的，則是豐衣足食的，則是有計劃地走向機械化電氣化的境界的。如果不發展生產，就不可能達到這個目的。發展生產，在現在這個階段，甚至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是以農業為主的。這並不是說，工業不注重，而是說，在發展農業的前提下去發展工業。澈底的土地改革，澈底的平分土地，就是實現耕者有其田，奠定了農業發展的前提。這樣的發展農業，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現在在一些比較穩定的解放區，就在這種方針之下，進行其經濟建設的。今年（一九四八）東北解放區的經建方針就是一個例子。這個方針是這樣的規定着：「以農業為主，發展農業，發展工業。在發展公私經濟，增加國家與人民財富的基礎上，以達到繼續支持大規模的自衛戰爭，鞏固與擴大解放區，逐漸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它的基本要求的第一條便是「大量發展農業，把增產糧食作為首要任務，並發展棉麻特產與農村副業，以保證我解放區有豐富的糧食與工業出產」【註一】

在土地改革成功之後，發展生產就成爲一等重要的工作了。要使發展生產能收到巨大的效果，必須使生產與群衆結合，使生產成 群衆運動的中心環節。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群衆勞動熱忱，嚴格勞動紀律，加強勞動力的組織」，才能有效地普遍地提高生產技能，在生產 提拔與培養新的技術幹部。

從經濟性質來說，發展生產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政府不但致力於發展公營經濟和合作經濟，而且致力於扶助民營工商業的發展。以今年東北解放區的經建方針而言，其第三條就是這樣指出：「扶助民營工業的發展，保證正當的私人工商業，使之有利可圖而有利於支援人民的解放戰爭」。在這裡，類似厘金關卡的過境稅是必須廢除的；對於投機的商業是必須加以嚴格禁止的，對於封建性的商業組織如牙行及經紀行之類，是必須加以取締和改造的。但，這並不會斷絕商業的活動，反而是在提高商業的活動的。因爲牙行和經紀行會的超經濟剝削，是封建性的，是有害於商業本身發展的。民主政府將要建立新式的交易所和交易員，規定正當的手續費，保證正當的商業利潤。這樣的做下去，商場中買賣雙方都可減少損失了，還不是對於商業有利嗎？至於原來經營牙行和經紀行的商人，亦並不是沒路可走的，他們可以投資於其他的 商業，他們可以從事於新式的交易所的業務。路，多得很，他們是用不着怕的！

關於勞資關係，民主政府明確地採取了照顧雙方的政策。我們照顧勞動者的福利，亦照顧資方的營業和發展。因爲片面照顧勞方福利，則損害資方的營業；而忽視勞方的生活，則會損害生產工廠和

商店老板勞動熱忱。只照顧一方面，都是不對的，毛澤東同志很懇切的指出：

「對於中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份採取過左的錯誤的政策，好像我們黨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所犯過的那樣（過高的勞資條件、過高的所得稅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而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者的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這種錯誤如果重犯，必然會損害勞動群衆的利益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益。」

新民主主義國家是以雙方兼顧為措辦勞資雙方的關係的。有一些人不了解這種政策；有一些人則故意中傷，以為新民主主義下的資方絕無保障，將要遭受勞工的「欺負」，都是毫無根據的。毛澤東同志這一篇劃時代的報告，將粉碎一切的曲解與中傷，將明確地把新民主主義的福音廣播給中國人民，將有力地把新民主主義革命更進一步地推上勝利的大道！

一九四八·一·三·

〔註〕關於東北解放區經建方針第一條所定，在有了大城市以後便不能固執此原則，三十七年八月九日新華社社論「把解放區的農業生產提高一步」，提出：「除開那些只有農業沒有什麼工業生產的農村黨委，或只有工商業沒有什麼農業生產的城市及工廠黨委，它們應該唯一地或主要地以發展農業生產或工業生產為自己的生產任務之外，其餘所有有農業又有工業地區的黨委，特別是各中央局，區黨委等高級黨委，都應該以發展工業生產與發展農業生產擺在並重的地位。」

第三 關於官僚資本的逃遁和變形

樹倒猢猻散，南京偽政府是快到斷氣的時候了，這種情況，中國的人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那些殘酷而昏憤的統治者，亦何嘗不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他們就拼命地把一切能够逃避的資產，逃到他們認為穩當而安全的地區去了。

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在抗戰以前，在「發展國家資本」和「節制私人資本」的口實之下，瘋狂地在進行其化「私」為「公」的工作，於是，中國銀行從政學系的手裡被宋子文搶去了；交通銀行由交通系之手亦被國民黨搶去了；其他如中國通商銀行和中國實業銀行等等，亦返而為「公」，四明銀行等等亦由「私」一化而為「公」。換言之，國民黨四大家族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在「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口實之下，侵吞民間企業或其他派系的企業以肥壯自己。

在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四大家族更利用其特殊的條件，在積累和擴大他們的官僚資本，在形式上是「公」「私」（即四大家族以國家資本或私人資本）並用的，但是，自民國三十六年軍事形勢全面惡化以後，他們就開始準備後路了。他們的做法，不僅是化「私」為「公」，而且是化「公」為私。中紡估值股票上市，招商局股票上市，中華水產公司的出售，這就是例證。這種情形，自去年下半年蔣軍的主力在濟南、遼西和淮海諸役之後，反動的統治者更明白他們的命運，於是逃避資金的活動，就更加

瘋狂了。

國民黨官僚資本最近的做法，可以歸納為下列各點：

第一搬運黃金美鈔和其他寶物到美國去，宋美齡去年飛到美國去求援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帶了若干大箱，這些大箱是不經過檢查的。在這裡，誰能知道她是裝了些什麼東西呢？南京反動政府不斷的吸取人民的膏血，不斷地把這些膏血所結成的黃金和美鈔，都運動到美國去。去年八月間的「幣制改革」，用金圓券逼兌人民的一萬萬八千萬美金大部份是運動到美國去的；甚至我國極其名貴的八千六百件文物，亦被他們作賭注，悉數運送美國（見本年二月三日港大公報）。

據大公報所載，在蔣經國往台灣主持黨務之前，從南京上海運至台灣的黃金，就有一百四十噸（見本年一月十四日蘿報）。此後又不斷將金銀運動，大公報廣州專訊上說：「中央」銀行總分行於一月二十日下午將存於該行的黃金白銀共一百箱由軍艦運動到台灣；據路透社專訊，二十一日「上海外灘區晚間，在大陸軍警嚴密包圍之下，許多滿裝着笨重的箱子的貨車，自中國銀行退出（衆信這些箱子裝着金塊）轉運動到一艘登陸艇上去」。這樣陸續的運動出去，據估計，現在運動到台灣的黃金是四百萬兩以上，其他白銀美鈔，更不得而知。從這些賣國的敗類看來台灣固然比中國大陸安全些，但比美國是差得多了，因此，運動到台灣去的金銀是遲早會運動到美國去的，台灣只是到美國去的跳板而已。

除了運動金銀到美國去之外，香港當然亦是官僚資本認為可以存放金銀的地方。據本年一月二十

七日大公報所載，廣州央行經理丁批祺對陳述經及歐裔明說：「廣州分行收兌的及以前行轅主任張發

交還保存的接收田中久一移交的黃金五萬餘兩及港幣五千萬元，都已運到香港存放了」。這一報導當然只是大海的一粟而已。據各方的估計，官僚資本存在香港的港幣，當在二萬萬元以上，約佔港幣發行總數四分之一。

第二官僚資本不但搬運其細軟的東西到美國和台灣去，而且還盡量把粗硬的物資搬到美國和台灣去。以中央信託局為例，該局在貿易的名義之下，拚命把桐油數千噸運送紐約，而把呢絨、機器、顏料、生絲等物則大量運送台灣。據本港新生晚報本年二月二日所載，一月份運進台灣的汽車就有八百輛。官僚資本不但利用其政治特權把公家的東西，運送出來，而且還盡量設法使他們的私營企業得以加速出口。去年十一月間，南京偽政府將紗布外銷限額，放寬至「全國」各廠生產量百分之三十；今年一月間又訂了「新計劃」，將目前各紡織廠所存的紗布，先照各廠輸出的限額，大量出口到香港，此項紗布運到香港後，存在中國銀行倉庫，銷售本港及南洋各地，出售後所得貨款存於中國銀行內。這分明是官僚資本逃避資產的另一套辦法。

第三是把菲律賓作「安放」資金和活動的另一場所。交通銀行最近除了把國內劃分為三個區域（即京滬區、華南區與西南區）之外，並成立海外區，而以他們在菲律賓政府註冊的「菲律賓交通銀行」，作為中心。這個菲律賓交通銀行的資本是中國的交通銀行撥進的，但它是一個菲律賓的法人。錢新之和趙棣華等打算在國民黨完全垮台之後，把他們的攤子擺到菲律賓去。此外，孔祥熙之子孔令佩計劃以菲幣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為資本，在菲開設一公司；蔣朝駐美大使顧維鈞之子亦打算在

菲開設工廠，並增加他的進出口貿易公司的資本到一〇、〇〇〇、〇〇〇菲元；孫科的帳房黃漢樑正活動以二千五百萬美元在菲律賓設立一個銀行。菲律賓現在不但成為官僚資本投放資金的樂園，而且又成為官僚黨棍與投機商人做大宗貿易的市場。現在有不少官僚黨棍，在馬尼刺拋出上海的地皮的。據說吃進的多為猶太商人，他們吃進的動機是因為價格便宜，差不多打個對折。官僚黨棍在馬尼刺拋出地皮收入美鈔，而猶太商人則在馬尼刺付出美鈔在上海收入地皮。這種兩相情願的買賣，正在菲律賓的市場中發展着。

第四是對於某些企業，盡速解散，如中央合作金庫，就是一例。該庫是CC利用國家資本的一個機構，這個機構現在差不多要宣告解體了。至於不能解散的機構，則盡量挖空其生財資金，例如「中紡」方面遷台的紗綻達九萬鎰之多；搬不走的，則轉移至某些民間企業之內。這種做法，自然是耗費心機的。保存原組織的招牌，保存人們對於它的注意，但，內容早就是空的了。這就是由官化民以圖保存財產的一個好辦法，可是，官僚資本的變形，還不僅僅如此。

第五是將過去與民間資本合資的企業，盡量化裝為民營。這就是將官僚資本的股票盡量化名轉戶，或將這些股票轉售給商人，而一些不明情況的民間企業家，因為他們過去與官僚資本合夥，恐受沒收的株連，故常常依順官僚黨棍的意思，完成官僚資本的「好事」。

官僚資本的逃避與變形，無一處不是以中國的人民為犧牲的。官僚資本把他們已經從人民身上所搜括的資財，直接送到美國和菲律賓去，或經過台灣再送到美國去。他們是絲毫亦沒有國家民族的觀

念的，他們爲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把中國賣給外人，可以把一切權益送給美帝，可以把一切金銀財寶放在垣街老板們的保險箱裡。他們沒有祖國，如果有的話，那就只有美國了。他們是黃皮膚的美國人；祇有獨佔資本的美國才算是他們的祖國！

「不到黃河心不死」，沒有到了絕望，官僚資本是不會洗手不搶劫的。更正確的說，官僚資本越是走近絕路，越會瘋狂的搜括。宋子文這次下台，臨行還拆了一次爛污，搶了廣州四百萬港幣，計於一月二十一日吸進了三百萬元，二十二日吸進了一百萬元，而廣東省行又在此時搶進五千萬擔糧食，這樣一來，廣州的港幣和米價自然沒法不飛騰，廣州人民的生活，自然沒法不更加痛苦了。

越接近滅亡，統治階級搶劫得越兇；這是一個極其明顯的法則，在這裡，在搶劫的當中，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是跟着搶劫之加強而加強的。但，他們的矛盾之加強，却處處又在加深其對人民洗劫的程度。例如白崇禧利用其在湖北的勢力，曾經扣截了「中央銀行」南運的五百萬白銀，當宋子文正在廣州大量吸進港幣的時候，他亦派遣爪牙，在廣州訂購了八萬兩（司碼）的黃金。以一月廿日金價折算，值港幣二千六百萬元，值金圓券九億三千六百萬元。這麼一來，廣州的黃金就從一月十九日的三〇九港元，漲到二十日的三二二元了。垂死的統治者一面拋出金圓券；一面則扒進黃金、港元或糧食。黃金、港元或糧食是被他們搶去了，但存在市面的却是不值一錢的金圓券。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統治者之搶劫物資或逃避資金是與它的惡性通貨膨脹，互爲表裡的；是以廣大人民的生活之痛苦作為前提的。

以國民黨四大家族爲首的官僚資本，現在正在想盡一切方法，進行其逃避和變形的陰謀。但，這種陰謀是逃不出中國人民的眼睛的。對於戰爭罪犯，無論逃到天涯海角，人民一定要追回他們來法辦；對於官僚資本，無論它怎樣化裝，怎樣變形，怎樣逃遁，人民亦是不會放鬆，不會讓其安然無恙的。我們希望某些利令智昏的人物，要冷冷腦筋，勿再爲官僚資本想辦法；我們希望那些過去與官僚資本合作的民間企業家，要認清事實，過去的不必說了，今後就不應再成全官僚資本的「好事」；我們更希望一切在官僚資本機構中做事的職工，要在這個緊要關頭，弄清真相，把一切實實在在的情形，貢獻給民主政府！

少讓官僚資本逃遁一分資財，就爲中國人民保留了一分元氣，少讓官僚資本隱埋一分資財，就爲新中國的建設增加一分力量。與官僚資本有關係的一切職工與企業家，這是你們對國家民族服務的時候了！

五 城市經濟的改造

一 蔣管區城市經濟的危機

國內大部份的城市，目下還是在蔣政權統治之下的。這些城市的人民過着的是一種畸形的、矛盾的，岌岌不可終日的日子。這種岌岌不可終日的危機，就連南京國民黨所御用的報紙，亦連續累牘的登載出來了。

蔣管區城市經濟的危機，可以從下列一些矛盾中看得出來：

第一是城市與農村的尖銳的對立。蔣管區的城市，特別是那些「現代化」的大都市，是帝國主義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堡壘。帝國主義大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不計餘力的向廣大農村，作無情的剝削，造成農民的窮困，造成農村的破產，並進而造成農村偏枯凋敝而塵蟄的畸形現象。農民的血汗，一滴一滴地流入都市，但都市膨脹的結果，却失去了它的廣大市場，失去了主要的糧食糧餉的供給。蔣管區的城市大都與農村割離了，與農村對立了，逐漸被農村所包圍而陷於孤立了。如果把政治和軍事的因素和關係一齊來看，則蔣管區今天城市孤立的程度，幾乎是達到窒息或凍結的程度了。

第二是城市（特別是都市）的畸形繁榮，已經達到使人不可忍耐的程度。官僚資產階級和逃進城市的大地主，挾其雄厚的資金，在市場中不斷地興波作浪。他們從事於黃金和外匯的投機，從事於商品的走私與囤積，從事於特種企業的獨佔與壟斷。以四大家族為例，除了被他們所操縱控制的幾家企業以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以私人企業出面的公司，如孔祥熙的揚子公司和長江公司，如宋子文的孚中公司和金山公司，如CC系的齊魯公司中茶公司和絲織品產銷公司等等，這些公司都是無惡不作，有錢必賺的。都市的膨脹，在本質上，就是大官僚資本的膨脹，但是，大官僚資本的膨脹，却正是中小商業的衰落。在上海，在天津，在廣州以及漢口，這二年中小商業關門倒閉的數目是日新月異的。以天津為例，據該市商務日報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所引統計數字，全市共有大小工廠五千餘家，經常全部開工的僅佔百分之一；局部而經常開工的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十的工廠已陷入停工狀態；其餘百分之五十五的工廠則均處於半停狀態（指局部開工但時開時停）中。津市工業全部產銷數最多也不過等於全部開工時銷量的十分之一，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繁榮的代價！

第三，不但大城市中分化出冷暖的兩極，呈現出中小商業與大官僚資本的尖銳的對立，而且在大城市與小城市之間，亦呈現出前者更加膨脹而後者不停地沉入衰落的深淵。在蔣管區內的都市，現在（一向亦是如此）最繁榮的是上海，其次為武漢，廣州，天津和重慶，除此以外的一般中小城市，都是氣息奄奄的。以湖南的衡陽為例，抗戰時期有商店一萬多家，三十五年底只剩一千四百七十二家，倒閉及抗戰時期七分之一，而三十五年南貨等十五個行業，倒閉的即有一百七十家，佔百分之十三。

陽抗戰前有一千五百家商店，現僅存五百餘家，而且都是只有法幣幾十萬元的小資本。湘潭是抗戰中湘省受損失最輕的一個城市，但抗戰結束以後，綢布等十八個行業，倒閉與停業的就有二百七十四家，佔百分之三十，原來著名出口貨——米，油與茶葉，在蔣朝的官僚資本統制與低價收買之下，產量與銷路都一落千丈；馳名全球的錫礦礦產也差不多完全停頓了。大城市變得更大，小城市變得更小，這就是管區的官僚資本支配下城市經濟的另一個必然的法則。可是，就是大城市與大城市之間，亦是不斷地在走向集中的。天津與上海的關係，正正表現了這一點。今年一月間赴南京請願的北平市參議員許惠東就這麼的說：「中央的申匯停止辦法，使一個月內北方現鈔南下者七千億，但據八月（指三十六年）份統計，北平商業銀行存款只有三百億，天津亦只有一千二百億，以後雖有增加，勢必流乾。中央銀行每天一架遞鈔機，亦無濟於事，且匯水每萬已漲至二千五百元，則每天在北方又貶值四分之一，物價焉能不貴？天津有一怪事，即對外出超而對匯入超」（見今年一月七日上海大公報），夫公對上海入超，就是前者隸屬於後者的表現！

第四，蔣管區城市經濟危機的尖銳化同時亦就是蔣管區社會危機的尖銳化。這種社會危機呈現為工人大戰，公教人員及一般小市民對於反動的統治階級的激烈的鬥爭。工商業大量倒閉的結果，大量的工人失業了。以上海而言，失業工人就在三十萬人上下，如以每人有家屬三人計，則上海的生活無着的，將達一百萬人。以湖南的小城市湘潭一地而言，失業工人四萬八千餘人，佔原有工人三分之二，連家屬在內，一共有二十萬人是生活無着的。失業的固然面臨着生存的威脅；就是在業的，因為

實際工資遠落在物價之後，生活亦大大惡化了。職員和公教人員亦同樣在艱辛中過着日子。今天的蔣管區，少數人在過着酒醉金迷的荒淫無恥的生活，而絕大多數的小市民，則在過着啼饑號寒貧病交迫的非人生活。有不少貧民甚至闖進棺材莊與死屍共處，以棺材為傢俱，有不少貧民因為沒地可住，無衣可穿而凍死餓死的。從北平到廣州，那一處不是如此？去年上海和平津各處學生的反饑餓大示威，難道是偶然的麼？這一年以來，各城市所爆發的工潮、學潮、攤販血案（上海）和舞女請願的風潮（上海），難道是偶然的麼？蔣管區城市的經濟危機是與社會危機密切地結合在一的，是與廣大的小市民反對獨裁者出賣國家和專制壟斷的黑暗政治結合在一起的。

畸形的矛盾的城市經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必然的產物，是國民黨四大家族的黑暗統治的必然的產物。看吧，讓我們來看看那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而甘心作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國民黨政府，是如何在製造矛盾，如何在造成城市的經濟危機吧！

二 蔣區城市危機的因素

國內城市經濟的危機，完全是國民黨政府製造出來的。國民黨政府用什麼方法去製造城市的經濟危機呢？

第一是蔣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除了大規模的奉送資源，讓美國的獨佔資本進來「開發」之外，

並且千方百計迎接美貨和日貨衝進國內來傾銷。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民族工業便沒法不被壓倒了。以漢口為例，那兒的捲烟廠因受不住美貨的壓迫和蔣政府背捐雜稅之榨取，從去年十月五日起，便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捲烟廠，自動停開夜工，減少生產；其在陝西，毛紡業稍有基礎的「廣大」及「新華」等公司，亦在美貨日貨的傾銷之下，沒法支持而宣告倒閉了。蔣朝四大家族是在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扶持中壯大的，因此，他們不惜變本加厲的為牠們的主子效忠，希企在出賣民族利益的勾當中，取得一點回報！

第二是國民黨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的對於國民經濟的獨佔壟斷。四大家族及其附庸，利用其政治特權，掠奪國家資本，吞食民間資本。牠們獨佔了整個蔣管區的金融與通輸，獨佔了整個蔣管區的對外貿易，獨佔了整個蔣管區的輕重工業。牠們利用其經濟的和超經濟的權力，進行一種「合法的」和非法的操縱，囤積和走私，進行一種公開的露骨的限制、統制和包辦，不斷的打擊民間的正當工商業。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小工商業又怎能不一天比一天衰敗起來呢？以廣州而言，依靠入口原料進行生產的工廠，因受蔣朝的輸委會的限制，而不能進行生產者，全市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三是蔣政府的內戰和通貨膨脹政策。蔣政府的內戰破壞了全國的生產機關和運輸機關。工業和農業的生產機關因砲火的破壞而降低其生產，反之，內戰的軍事需要則需要更多的物資。民間或半民間的運輸機關都因蔣政府之征用而陷於停頓了，「民生公司」不是一個例子麼？決心要打內戰，在財政上只有乞靈於惡性通貨膨脹。蔣朝通貨膨脹的程度，差不多可以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匈牙利

並想齊騙了。據最低的估計，截至三十六年年底，法幣的發行額是在七十萬億元以上。弄到萬元票面的法幣，差不多抵不上印刷成本。通貨越膨脹，法幣越跌落，則整個工商業就越沒法經營下去。因為賣出去雖然可以賤錢。但第二次要進貨，却沒法購得原來的商品和原料了。幣值越跌，貨價越漲，要保持原來的生產規模，就非有加倍或三四倍的貨幣量不可，但，國民黨政府却又在大玩其「緊縮放款」的花樣。正當的民間工商業實在是被緊縮了的，但官僚資本自己却在「緊縮」聲中，大大的獲得國家銀行的放款。這麼一來，中小工商業就更糟糕了。通貨膨脹不僅打擊中小工商業，更重要的是，是打擊固定收入的工資勞動者、職員和公教人員。他們的收入之調整是落後於物價之上漲的。所謂生活指數完全是統治階級的騙人的花樣，與實際是差得很遠的〔註〕。廣大的小市民層都破產了，他們那能有購買力呢？他們失去了購買力，工商業還有什麼市場呢？

第四 蔣政府不但用牠的通貨膨脹政策來沒收職工和公教人員的血汗收入，來加重民間中小工商業在經營上的困難，而且用牠那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苛捐什稅來對廣大的人民進行剝削，在農村，除了三征之外，還有許許多算不清的捐稅；在城市，亦何嘗不是開辦了天羅地網般的苛捐什稅呢？最近廣州市商會據電鍍商業同業公會呈報：「略以復員後，各項捐稅林立，其新辦之稅捐章則，因屬新訂，名目繁多，難於分析，即舊有者，辦法另行改訂，與前迥異，至繳納手續，尤為分歧。……即每店多僱一件；專司捐稅者，亦不易完全清楚繳納手續」（見本港去年十一月九日華僑日報）。苛捐雜稅雖則最終是由廣大的人民來負擔，但商店和工廠必須提前墊出這一大筆基金，這是對工商業都不

利的，何況，捐稅苛雜減低了人民的購買力，削弱了工商業的銷路呢？

國內城市經濟衰落的原因是很多的。廣大的農村，因為封建及半封建的剝削而陷於破產，當然是最基本的因素。但，統治階級對於城市經濟的直接摧殘，亦不宜加以忽視。上面所談各點，都是屬於這方面的。根據這種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國內城市經濟的危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是國民黨四大家族的血腥和黑暗的統治的結果！

三 解放區如何改造城市經濟？

要澈底解除國內城市經濟之危機，只有推翻廿餘年來，蔣政府的血腥和黑暗的統治，只有結束那種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組織，這是再明白亦不過的事！今天人民解放軍的不斷的勝利和震撼全國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運動，就是在替城市經濟的改造奠定前提的。蔣政權崩潰了，則帝國主義資本的侵略，官僚資本的獨佔壟斷，通貨膨脹和苛捐雜稅等破壞城市經濟的因素，便可一一取消；而土地改革的偉大勝利，則將澈底地解放了農村，澈底地取消了城市與農村的對立。

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但要澈底解放中國的廣大農村，而且亦要解放中國全國的城市。在中國土地法大綱中其第十二條規定：「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這就可證明：我們在進行土地改革的時候，就關照到城市問題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目標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

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要發展生產，要繁榮經濟，如果不去改造城市經濟，顯然是不可能的了。

改造城市經濟的重要工作，一方面是沒收蔣××，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一方面是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沒收官僚資產階級的官僚資本絕對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絕對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沒收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不但不會影響到中小資本，反而可以促進中小資本的發展。因為四大家族及其附庸的壟斷統治被取消之後，中小資本在民主政府的扶助之下，將會獲得長足的發展。

民主政府之保護工商業，絕對不是空言，而是有鐵一般的事實作為證明的。以東北為例，據今年二月十七日新華社東北電訊，中共合江省委日前頒發平分土地運動中保護城市工商業的指示，指出有些縣已發生了違反城市工商業政策的現象，如地主兼營工商業的，他的工商業被沒收；有的是「八一三」後土改前已全部或部分轉為工商業的，也被全部沒收；甚至過去被匪寇奪去土地而轉為工商業的，現在還當作地主處理。這個指示規定：地主兼工商業的只沒收鄉村中土地及其他封建剝削部份，廢除高利貸，其他一律不動。一九四六年七月土改前的純工商業者，不管過去是否地主，一律保護。除在全興全市佔統治地位，罪大惡極的漢奸，大惡霸，大特務，大地主的工商業；土改後逃避鬥爭，做點小買賣的化形地主和反革命蔣特的僞裝工商業，堅決沒收外，其他過去有錯誤和缺點，而現在服從政府法令的工商業者，只要在政治上坦白改過，不能藉故沒收其工商業及財產或任意罰款。石家莊民主市政府最近亦佈告保護與發展民族工商業，指出：「保護工商業者合法之財產和營業，任何人不

得侵犯。所謂『平分』工廠商店之流言，完全是無知謬論及蔣×特務故意破壞我工商業之陰謀」；「凡與工廠、作坊、店舖發生糾紛而不能自行解決者，不論個人或團體，准其到法院控訴，依照法律程序解決，不得私自採取變賣或罰款、沒收等非法手段，違者予以適當處分」，各地的民主政府都是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的，毛澤東同心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

解放區民主政府對於工商業中的勞資關係是遵守毛澤東同志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總方針的，因為忽視勞工的生活，一定要損害生產者的熱忱，而片面照顧勞方的福利却是一種近視的有害的辦法。

新華社紀記「二七」二十五週年的社論中，很明晰的指出：

「應當知道：新民主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之點，就是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裡私人資本的企業在生產中還是不可缺少的成份，破壞這部分企業，對於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及其國家政權是非常不利的。正因為如此，工人應當堅決反對那些進行怠工，進行關廠，進行破壞的私人資本家，同時，對於願意繼續生產下去的私人資本家則應當與之共同工作，發展生產，繁榮解放區的經濟，並在這個基礎上，一方面確定保證工人的適當生活；另一方面保證私人資本家的適當利潤」。

解放區的工廠和商店，在雙方兼顧的原則之下，勞資關係和東伙關係都走向合理的途徑，一切都

經過平等協商的手續，任何一方，不得強制另一方。經過了這種改革，勞工和伙夥的生活逐漸改善了，但廠方和店東却反而取得比以前更多的利潤。哈爾濱的老巴奪（Lobato）烟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見香港版群衆第二卷第五期）。

解放區的民主政府絕對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本位的，因此，對於蔣朝的病國害民的苛捐雜稅，澈底地予以取消。這種苛捐雜稅取消以後，解放區的工商各業就會大大地發展。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線電訊：豫東解放區，「由於民主政府廢除蔣記統治時之苛捐雜稅，市鎮上生意，逐漸興隆」，就是一個例子。

解放區的民主政府，不但替工商業的發展，解決了許多的困難，而且替一般城市平民解除了許多的困難。城市中工商業的借債，並沒有取消，但利息是被抑低的；至於那種剝削平民的印子錢和當典，則在禁止限制之列。有些地方，初期的辦法是：在被規定的利息之下，當典只許贖不許當，過期而未拍賣的當物，仍讓原主贖回！同時，城市的小本經營由地方金融機關低利放款。對於無家可住的平民，則分配給那些被沒收的房屋（漢奸、賣國賊、內戰罪犯及惡霸的房屋）以資居住；對於那些找不到職業的城市貧民，則組織他們下鄉，給與他們以土地，使其從事於農業生產。歷史稍為長一點的解放區，都是沒有乞丐，沒有盜賊和沒有娼妓的世界。這情形，豈是蔣管區的人民所能想像得到的嗎？

解放區的城市經濟，經過這種改革，就大大地起了變化了。在這兒，勞工和夥記，廠家和店東，

雙方都得到保障，因此，雙方的信心和熱忱都大大地提高了。而住居問題與失業問題的初步得到合理的措辦，則是替城市的秩序與社會購買力，奠下一個大前提的。一切都在向前發展，一切都在欣欣向榮！這和蔣管區城市的岌岌不可終日的狀況，正正走着相反的道路。

蔣政權現在還保留一大部大城市在手裏，但是，人民解放軍正在火速的發展，這種發展將會使蔣記目下握有的城市，一座一座解放出來。長期過着衰落和畸形的生活的城市之獲得光明，為期是不遠了。城市經濟的改造，是大家的共同任務。我們希望大家起來共同負責，共同起來掃除那些代表買辦和封建勢力的蔣政權及其流毒，共同起來為建立新中國的城市經濟而奮鬥！

三十六年二月二〇日

〔註〕「目前工資發給所依的生活指數，尚不足物價指數之一半」見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上海大公報，俞培康「改善幣制的商榷」。

第五 論城市的社會改革

一 中國城市的社會特點

在解放戰爭第二年中，人民解放軍收復和解放了一百六十四座城市，這些城市都是具有軍事、政治及經濟的重要性的。鐵一般的事實，將不斷地昭示我們：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但要澈底解放中國的廣大農村，而且亦要解放中國全國的城市！在這種情形之下，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是一天比一天提高起來了。此次新華社在總結人民解放戰爭兩週年和指示第三年的任務的時候，把認真研究和正確執行對於新區和新解放城市的政策，作為我們第一個重要任務，便是明證。

在未提出城市政策的時候，我們應當先弄清楚中國城市的社會經濟的特性。

一般說來，中國的城市是一個複雜性的統一體，在比較舊式的中小城市中，有着中小工商業者工人勞動者和在鄉間擁有田地的地主紳士；在「現代化」的大都市中，有著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同時，亦有著中等的自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不論舊式的中小城市也好，不論現代化的大都市也好，它們都是充滿着矛盾性的。地主豪紳是與一般平民對立着，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和大地主是與代表民族資本的中小資產階級及勞動大眾對立着的。

所謂城市經濟主要是指工商業的經濟。一般說來，代表民族資本的中小資產階級，就是城市工商業的主體。這些工商業的主體，在舊式的中小城市中，是受着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機構所壓迫的，是受着那些與國民黨朋比爲奸的土豪劣紳所壓迫的；在現代化的大城市中，是受着國民黨的反動的統治機構及其官僚資本所壓迫的，是受着國際帝國主義——特別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壓迫的。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經濟之所以沒落倒退，中國的民族資本之所以日趨式微，其基本的原因就是在此。

中小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小資產階級所經營的工商業，在南京蔣朝統治之下，是被壓迫，被摧殘的。和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官僚資本相反，他們所經營的正當的業務，是有益於人民的，是爲整個國民經濟所必須的。國民經濟需要他們增加生產，供應各種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國民經濟需要他們及時的轉運各種物資，使其解決各方面的需要。因此，我們斷不能把那些有益於人民和國民經濟的民族工商業者，當成農村中的地主富農，亦不能把他們當成國民黨的官僚資本階級，這是談城市的社會改革時所不可不注意的。

二 城市社會改革與農村土地改革的區別

由於中小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城市中佔絕大部份，由於中小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爲國民經濟不可缺少的部份，因此，城市中的社會改革與農村中的土地改革不可混爲一談。要明白此中的區別，我們還應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說起。

毛澤東同志反覆的指示我們：「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不是任何別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中小資產階級既然不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那末，城市社會改革的任務，當然要與農村中土地改革有明確的區別了。

在農村中，土地改革的對象，只是地主階級和富農的封建剝削，他們在封建剝削以外所經營的商業，是受到保護的。因此，在城市中，社會改革的對象就只有官僚資本和代表反動勢力的國民黨的統治機構了，中小資產階級是受到保護的，此次新華社的社論說得很明白：

『城市中社會改革的任務和方法，與農村中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完全不同，其所應採取的步驟也應當更為慎重，城市中的革命對象今天一般的只限於國民黨反動統治機構和真正的官僚資本家，對於民族資產階級，我們的任務不是革命，而是聯合和改良。』

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聯合和改良的態度，乃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當前歷史階段總路線和總政策所得出來的必然的結論，絕對不是一種斷章取義或臨時應付的「外交辭令。」

由於任務不同，所以，在方法上亦就不同了。在農村中，革命的對象是地主與富農的封建剝削，故我們必須贊助農民平分土地的要求，因為平分土地是消滅地主富農的封建剝削最徹底最有效的辦法。

法。當然，平分土地並不是提倡絕對平均主義。毛澤東同志說：「誰要是提倡絕對平均主義，那就是錯誤的。現在農村中流行的一種破壞工商業，在分配土地問題上主張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的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我們必須批判這種思想」。絕對平均主義在農村中走不通；用這種平分的辦法來對付城市工商業，當然更是走不通了。因此，在城市社會改革中，其所使用的方法是與農村中土地改革完全不相同的。新華社的社論說：

「對於城市中的生產資料，除了確實被官僚資本所強佔並可能發還的民間工商業財產，仍應發還，以利生產的發展以外，其他一律不得分散，並盡一切力量保證其繼續生產或恢復生產。」

這就是說，城市中的生產資料是以保存其原來的狀況為原則的。所謂保存其原來的狀況，是對「分散」而言，並沒有保持落後的意思。因為只有盡量保持生產資料的原來狀況，才能繼續生產，才能迅速恢復生產，才能更進一步地把生產發展起來。

三 依靠生產，依靠從事生產的群衆

在任務和方法上，城市的社會改革與農村中的土地改革，是有區別的，但在解決困難的途徑上，兩者却是一致的。

「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

生產」。消滅封建制度是爲了發展農業生產，更明確的說：「發展農業生產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

只有消滅封建制度，才能取得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在任何地區，一經消滅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黨和民主政府就必須立即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任務，將農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轉移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面去，組織合作互助，改良農業技術，改良種子，興辦水利，務使增產成爲可能。」（毛澤東）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一個生產衰落的國家。二十餘年來國民黨的統治，這個政權的長期的無情的剝削及其所招致的日本侵略和它所發動的殘酷內戰，使中國的經濟更加破產，使中國人民的生活更加苦痛，對於這個困難只有從發展生產中求得解決。在農村中，我們已經說過了，發展農業生產是完成土地改革以後的主要任務；在城市中，途徑亦是相同的，這就是：發展工業生產。

怎樣發展城市的生產呢？新華社的社論說得好：

「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也同樣除開依靠領導上的計劃性而外，必須依靠於發動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積極性，而爲達此目的，就須要在一切公私企業中實行必要的在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需要適當的提高勞動者的地位並適當的保障他們的生活水平。」

在新民主主義國家中，政治上是採取民主集中制；經濟上亦是採取民主集中制的。在整國國民經濟的範圍內，所謂經濟上的民主集中，就是在國家經濟的領導之下，發展合作經濟和私人經濟。它的集中，表現在國家經濟的領導上；它的民主，表現在各種經濟都能盡量發展上。因此，這裡之所謂集

中並不是壟斷獨占；這裡之所謂民主並不是絕對放任自由。在一個企業的範圍之內，經濟上的民主集中，就是在企業當局的計劃之下，發展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的積極性。它的集中，表現在計劃性的領導上，表現在勞動紀律的執行上；它的民主，表現在勞動者的地位之提高上，表現在勞動者在企業中參加某些部門的管理上。因此，這裡之所謂集中並不是企業當局的專斷獨裁；這裡之所謂民主並不是工廠中的無政府狀態。要實現公私兼顧與勞資兩利，是不能離開民主集中的原則的。

在蔣朝的統治之下，民主是絕對沒有的，因此，所謂集中呢，那就發展成爲獨占和獨裁了。它的獨占和獨裁，除了帝國主義和它自己的官僚資本主義之外，否定了中小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一切。這個反動政權，所知道的所努力的只有吞併和掠奪。生產，是根本和它絕緣的，正如新華社的社論指出的一樣：「依靠生產，依靠從事生產的羣衆，熱情地團結他們並向他們虛心學習，這是革命的共產黨人與封建的買辦的國民黨官僚之間的原則區別」。這種區別，強烈地「註定」了蔣府的必然敗亡，強烈地指出新民主主義之必然勝利！

四 避免過渡期間的混亂

如同土地改革一樣，城市的社會改革是必須分別地區的。「在暫時不能鞏固地佔領的地方，在游擊區，社會改革的範圍就更應當縮小到適合游擊戰爭的程度，而在只能暫時經過的農村和暫時佔領的城市，則企圖不應實行社會改革，而應盡可能少逮捕，少沒收，並盡可能維持原有的社會秩序，以免

「起對當地人民和解放軍都有害無益的損失」。人民解放軍在寶鶴和開封等地的措施，就可以作為這一點的明證。

在可以鞏固的地方，城市社會改革是必須進行的，但必須盡量避免過渡期間的混亂。新華社社論很明白的指出：

「凡在可以鞏固地佔領的地方，第一個要正確解決的問題，就是一方面必須堅決消滅一切反動武裝力量（包括國民黨軍隊、地主武裝、土匪等），解散一切反革命組織，逮捕一切持槍抵抗的分子、真正的破壞分子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罪魁，沒收真正的官僚資本和真正反革命罪魁的財產，以便建立人民的統治；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嚴格規定逮捕和沒收只能限於上述的範圍，並只能由指定的組織來執行，又必須切實保護除此以外的一切公私財產、一切守法的民間工商業者（無論其經營的規模如何），守法的文化宗教團體和守法的外僑不受侵害，又必須盡量留用國民黨經濟教育機關中的守法人員及其他可以留用的人員，以便安定社會的秩序，避免過渡期間的混亂和脫節。只有採取了上述的措施以後，才能依據羣衆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逐步的進行必要的和有一定限度的社會改革工作。」

人民解放軍必定是勝利的！這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中國必定是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多一分破壞，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分損失，就是中國人民的一分損失，因此，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就盡可能的來避免損失了。在土地法大綱中除了規定保護名勝古蹟以外，其第十四條更明白的寫着：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間，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護人民的財富，應由鄉村農民大會或其委員會指定人員，經過一定手續，採取必要措施，負責接收、登記、清理及保管一切轉移的土地及財產，防止破壞、損失、浪費及舞弊。農會應禁止任何人為着防礙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殺牲畜、砍伐樹木、破壞農具、水利、建築物、農作物或其他物品，及進行偷竊、強佔、私下贈送、隱瞞、埋藏、分散、販賣這些物品的行為。違者應受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

對於城市，中共中央在今年的「五一號」中曾明確地號召蔣區的職工，「在解放軍佔領城市的時候，自動維持城市秩序，保護公私企業，不許×××匪徒破壞」。

如果說；「依靠生產，依靠從事生產的羣衆，熱情地團結他們並向他們虛心地學習。這是革命的共產黨人與封建的買辦的國民黨官僚之間的原則的區別」，那末，保護公私企業，保護人民財富，一心一意地為恢復生產發展生產而努力，乃是前途萬里的充滿着朝氣的革命的共產黨人與日暮途窮的快要走進墳墓的反動的國民黨官僚之間的另一個原則上的區別。蔣朝的文武百官，上上下下，無一不知道他們快要完結。於是就拼命準備後事，就拼命搶錢到海外去作寓公了。崩潰得越厲害則這種醜態亦就越加明顯。用不着我們去找材料，只要注意每天的報紙，就很夠了。•

五 一些疑慮的解釋

國內和香港一些工商界的同胞，對於解放區的城市社會改革，還有不少疑慮。這些疑慮可以歸納為三點：第一是擔心人民解放軍要把農村的土地改革搬用到城市的工商業來；第二是擔心解放之後工人要壓在老板的頭上，第三是擔心新民主主義政府建立以後不要私人資本，對於這些疑慮，我們是必須加以解釋的。

第一、在上面，我們已經指出城市社會改革與農村的土地改革在任務和方法上是不相同的。城市社會改革的對象乃是國民黨的統治機關和官僚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中小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因此，民間工商業是受到保護的；使用平分土地的辦法來對付民間工商業要受到痛斥的。開始土地改革的時候，少數某些地區曾經有過這種現象，但早就扭轉過來了。

第二、在解放區中，由於民主政府的勞資兩利的政策之實施，由於勞動者在企業和社會的地位之提高，在每一個企業中，勞資合作的情況，絕非蔣管區工商界人士所能想及。解放區勞動者在改善技術上，在節省材料上，在遵守勞動紀律上，都有極大的提高。民主政府和無產階級的黨時時刻刻在教育工人；私人資本的企業在生產中是不可缺少的部分，過高的要求，就會破壞私人資本之存在，而私人資本之破壞，對於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以及其國家政權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解放區中，工人階級所要反對的是那些進行怠工、進行關廠、進行破壞的私人資本家，而對於願意進行生產下去的私人

資本家，則是竭力與之合作的。爲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工人是不會壓在老板的頭上的。

第三、現在工商界還有不少人士在懷疑，認爲保護私人工商業乃是中共暫時的口號，到了成功以後，它便會一腳踢開。這種疑慮是相當普遍的。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不應從任何人的主觀出發，而應從客觀環境的需要出發。

中國的面積如此廣大，人口如此衆多，而經濟又如此落後，要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斷非國家經濟與合作經濟在短期內所能完成，在這裡，如果抹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政策而否定私人資本的存在，那一定是失敗的。

不庸諱言，共產黨人是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是一心一意地爲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奮鬥的，但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中，只有而且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的階段。在新民主主義政權統一全中國以後，在一個長時期中，必須讓私人資本中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份得到發展。如果不是這樣，生產就不可能普遍提高，經濟就不可能加快繁榮，社會主義的實現亦就成爲空中樓閣了。所以，在一個長時間內發展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私人資本主義，是不成問題的，是沒有什麼疑問的；在這裡代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小資產階級，所應考慮的不是私人資本在新民主主義國家中存在不存在的問題，而是他們的私人資本是否有益於國民經濟的問題。

對於工業的保護，是很明白的：商業呢？我可引任弼時同志的一段話來作答：

「商人當然有剝削，商人的商業行爲本身不生產任何價值，他們或者是分享資本家一部份

利潤，或者是直接對生產者消費者實行剝削。有時囤積居奇，作投機事業，爲害更大，但問題不是要去破壞商業，而是去領導商業。要能掌握整個商業的發展，要商人爲我所用，而不要我們爲商人所用。這種政策對於人民固然是有利的，對於正當商人也是有利的。至於小商小販大部份是貧苦的，他們的生活只相當於貧農中農或富裕中農，更不應該去打擊他們，如在陝北高家堡所發生的破壞商業的情形，絕對是錯誤的。那裡商業搗垮了，老百姓買賣東西將要到榆林神木或鎮川堡，那就很方便。因此，我們對工商業應採保護和領導的政策，絕對不能破壞，破壞是一種自殺政策。」（見羣衆週刊三十七年十一期第八頁）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在一個長時期中，有益於國民經濟的私人工商業，是有發展的餘地的。在這個長時期中，民間的私人工商業只要在國家經濟領導之下，進行對整個國民經濟有利的業務，那末，它就能夠發展。它就能夠在新民主主義的大家庭中站住它的地位。在這裡，有人還會追問：「將來怎麼樣？」將來嗎？自然是要走向社會主義去的，不過，這斷非短時期所能實現，而在發展的過程中，私人資本可能採取與國家經濟合作的方式，改爲合作經營，或者經過分紅制度，把工人的紅利變作股本（這自然要得工人的同意），而成爲合作經營，總而言之，在國家經濟的領導之下，私人資本不但在一個長時間獲得發展的機會，而且在整個國民經濟的進展中，亦將獲得牠們合理的歸趨。

新民主主義之在全國取得勝利，不但對於勞苦大眾和小資產階級是一道福音，就是對於自由資產階級亦是一道福音。自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將在新民主主義國家中獲得其巨大的發展，因此，我

我們希望中國的自由資產階級拋棄一切的疑慮，採納國民黨的諭言，同廣大的工農大眾和智識分子一道為新中國的建設而努力！

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

第六 新中國在大步前進

一 大變化的一年

一九四八年逝去了。這一年，真是大變化的一年，在軍事上政治上是如此；在社會經濟方面，亦是如此。

這一年的大變化，表現在蔣管區的經濟從崩潰走進總崩潰；表現在蔣政府的經濟，酷似雨果(G·Hugo)的小說「懲懶」中的主人翁一樣，越掙扎，越會增加其活埋的程度，結果只有從頭到腳，深深地埋在鬆沙裡面，只留下幾根頭髮，在沙面上吹動而已。

這一年的大變化，表現在解放區的經濟建設，正同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一樣，奔騰澎湃地在進展着；表現在土地改革後的農村，正在大步地開展其農業生產；表現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不但在農村方面打下了它的基礎，而且亦在城市方面打下了它的基礎；不但手工業像雨後春筍一般，在各地茁長着，而且現代化的新式工業，亦在各個新解放的大城市中，恢復起來，建立起來。

這是大變化的一年。在這一年中，舊的中國在死滅着；新的中國在前進着。舊中國與新中國的軍事力量的對比，起了急劇的變化；舊中國與新中國的經濟力量的對比，亦在起着急劇的變化。今後的

好，就讓我們來看看舊中國的經濟是崩潰到什麼程度，來看看新中國的經濟是發展到什麼程度吧。

二 蔣區經濟陷入總崩潰

蔣管區的經濟，從所謂「幣制改革」之後，就深深地陷入總崩潰的深淵之中了。蔣管區經濟總崩潰的特徵，可以歸納為下列八點。這就是：

第一、跟着軍事的崩潰，蔣朝的破產了的財政，日益成為蔣區經濟崩潰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個主要因素是四大家族的瘋狂的搜括與掠奪，使蔣區的物資供應，日形缺乏。）這半年的支出，在預算上，從法幣九千萬億元（合金圓券三億元）一下子就跳到金圓券十六億元，而實際支出是很可能突破一百億「金圓券」的，收入呢，頂多只有九億元而已。對於支出說來，這不是一點微乎其微的尾數嗎？所謂「幣制改革」當然是促使財政支出急速增加的因素，但，主要的還是破產的財政在發生其巨大的作用。破產的財政，使它的貨幣（從法幣到所謂金圓券），沒法不瘋狂的膨脹，使它的所謂「幣制改革」，使它的所謂「金圓券」，沒法不在轉瞬間變成廢紙。「金圓券」出世不到三個月，就跌去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價值；在短短八十餘天中，就走完了法幣十四年間所走的旅程。說得更週到一點，蔣朝的惡性通貨膨脹，在所謂「幣制改革」之後，就更成為絞殺蔣區經濟的力量了。

第二是在空前的惡性膨脹之下，蔣朝的貨幣（所謂「金圓券」），就失去其作為通貨的機能了。

在今年八月以前，法幣已經成為一個爛羊頭。誰拿到法幣，誰就想盡一切方法，把它馬上脫手。因為保留一分鐘在自己手中，就有一分鐘吃虧跌價的危險。金圓券出世沒有幾天，就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彌漫整個蔣區的搶購運動，不是明證麼？它的行市不斷地在下跌，因而使它不但失去其作為價值符號的作用；而且失去其作為支付工具和流通工具的作用。膨脹和跌價的結果，「金圓券」失去其作為通貨的機能了。

第三是在惡性通貨膨脹和蔣政府的巧取豪奪之下，蔣區中的工商業是沒法繼續其營業了。惡性通貨膨脹使工商業出賣其商品以後，沒法補進同量的原料和商品；而四大家族的壟斷獨佔，則使他們失去了一切營業的可能。一如國產和入口的必需原料，都握在這些特權者的手裡，民間工商業家是沒法沾染到一點的。至於損失和負擔，則盡量地加在民間的工商家的身上。蔣經國在上海當「經濟沙皇」的時候，強迫限價的結果，使紡織業損失了五千萬以上的「金圓」，使毛紡業損失了五百萬的「金圓」；使橡膠業損失了一千萬「金圓」，使化學工業亦損失了數百萬「金圓」。如果連同其他各業損失合起來，當蔣經國在上海限價的時候，上海的工商界的損失是不會少過於一萬萬金圓的。這樣的打擊，工商業的元氣，還能不完廢？搶購以後，原料用罄，市場冷落，而蔣朝的苛捐雜稅，却向工商業張牙舞爪，督必吃完而後已。現在，上海的新式工業，如紡織、麵粉、火柴、機器及鋼鐵等，都在減產停工；無錫的紗廠亦於十一月間全部停工。蔣朝一天不倒，則這種情勢將會更加發展，那是可

以斷言的。

第四、蔣管區的民間銀錢業，在百業蕭條和四大家族的壟斷獨占之下，早就陷在一個極其尷尬的局面中。「幣制改革」之後，情勢就更加嚴重了。蔣朝的所謂「幣制改革」，不但強迫民間銀行現金增資，而且強迫民間銀行將外匯資產，悉數移交「中央銀行」。外匯資產變成「金圓券」，變成日益貶值的廢紙之後，民間銀行的底子差不多抽空了，（當然，騙取金銀外匯一事，一般中小市民所吃的虧，比民間銀行，還來得更大）。搶購風潮一開始，存款便被提存；搶購風潮過去之後，整個市場就形成死寂一般的現象，放款亦無從談起了。沒有存款，也沒有放款，但開支却是不可減少的，不但不可減少，反而跟著「金圓券」之跌價而不斷增加起來，這麼一來，銀行只好吃着老本了。這怎能支持下去呢？

第五是城市與農村的斷流。所謂城市與農村的斷流，不但指農村已經解放，農村包圍了城市，而且指在人民解放軍尚未到達，或人民武裝尚未起來的時候，在經濟上，蔣區的農村亦是與城市斷流的。這首先表現在農民大眾之不使用「法幣」和「金圓券」，農村流行着以谷物為貿易本位的辦法。法幣或金圓券是從城市流入農村的；農民既然拒絕使用它們，那末，城市要從農村取得農產品，不是要發生問題嗎？其次是蔣政府的軍隊特務，到處橫行，到處掠奪。限價政策實施之後，城鄉間的經濟關係，幾乎走到凍結的地步。限價政策取消以後，情勢依然沒有改善，因為「金圓券」在限價取消後，跌得更快更厲害了，「金圓券」跌得越快，就越使農民拒用它，就越使這種廢紙流不入農村，就

越使城鄉的經濟關係僵化起來。

第六是糧食危機不斷地在各大城市開展出來。這一點是和上一點有密切聯繫的，但根據還不僅僅如此。據有關方面的估計，蔣朝的軍糧這一年（從秋後算起）要四千五百萬担，而各大城市及其他的地方配糧需要三千萬擔，在來源上，田賦「征」「借」頂多一千萬担，美帝可供都市的配糧八百萬担，共二千八百萬擔。供需相抵，尚差四千七百萬担。在內戰第一，軍事第一的前提之下，這二千八百萬擔還不够供應軍糧，更談不到都市配糧了。軍事越崩潰，地盤越縮小，糧食的來源亦就日益減少了。蔣朝的糧食，目下只能依長江以南的地區（事實上，這個地區能保持多少個月，亦是大成問題的），而一向產米最多的湖南濱湖各縣，今年發生大水災，連其他各地損失計算在內，可能達到九千萬担之巨。米源是如此枯澀，各大城市的糧食當然要大大成為問題了。上海的糧食雖因港米和美米的輸濟，而略有緩和，但危機根本是沒有減少的。糧食危機的發展必然使經濟危機發展成為社會危機。

第七是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的結合。在蔣國的城市中，除了糧食危機之外，還有其他很多因素是在促使社會危機之發展的。在城市中，工商業停頓的結果，失業的人數必然增加，在業的人，因為幣值不斷下跌和物價不斷上漲的結果，因為工資和薪金之增加落後於物價之上漲的速度的結果，生活之惡化，是必然的了。沒有收入（指失業者），沒有糧食，沒有燃料，冬天到了，沒衣可穿，沒屋可住。在城市裏，擠滿了這些無衣無食，啼飢號寒的人民，你想想，社會秩序能維持下去嗎？我們在南京和上海，看出了規模壯大的搶米運動；我們更在其他各地看見彼伏此起的搶米運動。這些運動雖然

在一個短時間緩和了，但，跟着局勢的發展，它必定是急速地在發展的。

第八是軍事危機與經濟危機之結合。蔣管區的經濟是靠槍桿維持的。蔣朝的槍桿如果一天握在手裡，則它的經濟局面雖則江河日下，還可維持下去，如果槍桿被打掉，那末，「樹倒猢猻散」，蔣管區的經濟，亦就成爲落花流水了。今年秋季大攻勢以後，人民解放軍的進展酷似疾風掃落葉，蔣軍是十萬接着十萬被消滅了；大城市是一個接一個被解放了。蔣軍的澈底被殲滅，是無可避免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蔣區的經濟危機就更加嚴重了。隨着軍事的潰敗，地區就更加縮小，物資的供給就更加缺乏。現在國內的全部產煤區（台灣在外）和大部份的產米和產棉區都在人民的民主政權統治之下；蔣區的燃料、棉花和糧食都一天比一天缺乏了。隨着軍事的潰敗，地區就更加縮小，「金圓券」的流通範圍就更加狹窄起來，這些騙取人民血汗的「金圓券」就會縮在少數城市之內。一面是流通地區縮小了；一面又在瘋狂的膨脹，這麼一來，經濟上的混亂，能倖免嗎？隨着軍事的潰敗，不但稅收的地區縮小，而且增加了財政的支出。打了敗仗，軍火，物資，人力甚至鈔票的損失都非常重大，新的補充自然要增加財政的支出。總而言之，到今天，蔣朝的軍事危機是與經濟危機密切地打成一片的。經濟危機使前線的士氣更加低沉；而軍事危機則使經濟危機發展得更擴大，更深刻。

蔣區的經濟已陷入總崩潰的深淵之中了，財政的破產使它的「幣制改革」迅速失敗，使它的法幣和「金圓券」先後失去其作為通貨的機能；而同時，生產過程起了變化，生產者不能維持其生產了；流通過程起了變化，貿易者沒法繼續貿易了。金融呢，被搶去外匯資金以後，無人存款，亦沒法放

款，銀行的正規業務亦宣告停頓了。從城鄉的關係來說，城市和農村斷流了，城市在鬧着糧食恐慌。

由於糧食以及燃料的危機之發展，由於失業人數之增加和在業者的生活之惡化，於是，經濟危機就發展成爲社會危機，而跟着軍事的不斷崩潰，軍事危機又不斷地在加深經濟危機的嚴重性。總而言之，今天蔣區的經濟生活完全是反常了，是與社會危機和軍事危機密切地打成一片了。

在這裡，我們應補充一點說明：

(一) 蔣朝的經濟總崩潰是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是跟美蔣崩潰之發展而發展，跟着蔣政權之終結而終結的；並不是說，經濟總崩潰一開始，就意味蔣政權之完結。

(二) 蔣區的經濟總崩潰，在地區上，在部門上是不平衡的；但它們彼此間又在互相推動。

三 高漲生產怒潮的解放區

(一) 農村生產的提高

面對着蔣區經濟的大崩潰，解放區的經濟，正以其欣欣向榮的姿態，在各地區各部門展開着。

今年華北解放區秋收甚好，平均有七成年景，其中太岳區平均達八成年景，山東解放區大部分收穫量平均爲六七成；東北各省的春耕夏鋤，亦獲得巨大成就，今秋平均收穫爲八成年景，其中以松江省爲最，該省今年收穫量可達六百五十餘萬石，超過今年增產計劃三倍半，陝甘寧邊區今秋亦告豐

確，全區秋季農作物收穫量平均可達八成。晉綏地區更為十年來未有的大豐收！這種情況主要是以土地改革為根據的。在土地改革的地區，千百萬翻身的農民個體經濟，成為今天經過土改的農村中主要和最大的組成部分，他們不但有土地，而且有牲口和肥料，正如新華社的通訊所說：「由於土地改革的完成，摧毀了封建半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大大提高了農民勞動的積極性。千百萬農民第一次獲得了屬於自己的土地、牲口等生產資料後，即掀起了農村各階層人民全體男女老幼的大生產運動。同時，根據平分土地後土地分散，經濟分散的情況，在自願兩利等價交換的原則下，組織起互助小組。這新的生產關係，保證了農村中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缺少勞動力的農戶種上了土地，提高了整個農村生產力，保證了第一年大生產運動的豐收，使廣大農民打下了興家致富的信心和物質基礎。」

今年華北東北及其他各解放區收成之好，除了上述之根據外，尚有下述各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是廣泛而深入的宣傳提高生產的政策，克服那些認為生產用不着領導的自流思想，因而不但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情緒，而且加強了幹部對於生產工作的領導。第二是廣泛進行技術指導，如太岳、北嶽、冀中等地農林處幹部，普遍下鄉，幫助農民選種、除害，推廣優良品種，提倡多犁多上糞。太行、黎城大部區村，經過三犁後始播種。第三，在部分遭水災地區，則大力進行疏水種麥，僅據冀魯豫六個縣及冀中白洋淀地區統計，即疏水種麥八千四百頃。第四，邊緣地區，由於發揚了過去的經驗，勞動和武裝自衛工作相結合，粉碎了敵人的破壞，完成了搶收搶種。由此可見，今年華北及東北之豐

收，並不是偶然的。

秋收是勝利地完畢了，冬季生產正在各地接着開展起來。冬季生產的內容除了產生細糧之外，更進行積肥、修建廁所、開油坊、粉坊、紡織等工作，為明年大生產運動準備好充足的資本與條件。現在，這種運動正在東北、華北、西北和山東各地開展着！明年農業生產的成就一定是大步地超過今年的。廣大農村的廣大農民，興家致富的基礎是打下來了。這種情形，和蔣誠的妻離子散田地荒蕪的農村比較一下，不是天壤之別嗎？

(二) 城鄉經濟關係的改善

由於城市的不斷解放，由於農村經濟的顯著提高，解放區中城市和農村的經濟關係上就不斷地改善了。以濟南為例，該市解放之後，由於四鄉、長清、肥城、泰安、聊城、禹城、臨邑等縣的農產品湧入市內，城鄉物資自由交流的結果，那些曾經狂漲的糧價和一般物價，就大大地下跌了。在解放較久的地方，如哈爾濱及石家莊等處，城鄉關係的增進，那是可以更明顯地顯示出來的。城鄉關係之改善，表現在：農村的物產暢快地流入城市，而城市的工業品及手工業品則順暢地流入農村。城市從農村得到大量的糧食和農產品，得到工業和手工業所需要的原料；而農村從城市中得到日用品。得到他們在農業生產和副業中所需要的東西。

(三) 工業生產在前進

在解放區的城市中，工業生產正在大步地前進着。以哈爾濱為例，公私工業之建立，真是日昇月異的。今年五月間，新開設的工商業共九百六十六家，其中工業就佔了七百家，資金共達二十二億一千餘萬元（東北幣當時每元合法幣五十元）增僱職工店員三千九百六十二人，新開的工業中有職業、皮革、膠皮鞋、電池、亞鉛華、玻璃及罐頭等等；擴大生產和營業的有二百六十九家，增加資金七億五千五百餘萬元，其中僅十家鐵工業即增資三千一百餘萬元。中和鐵廠即從去年售貨所得的三千多萬元中，抽出一千多萬元買了兩個車床，擴大生產規模。哈市新興的瓦斯（煤氣）、電線、化學碗、電木碗及膠皮鞋等業，經過幾個月克服原料和技術上的困難，已建立初步的規模。由原偽滿瓦斯工廠改成的實驗工廠，去年七月復工以後，今年七月間職工人數就較一年前增加七倍，而瓦斯產量就較偽滿時增加四分之一。八月份以來，續有增加。新開之工商業計一百四十五家，資金共九億五千五百餘萬元，其中工業佔一百十三家，資金七億四千餘萬元，佔新工商業資金總額七八%，資金在一千萬元以上者有二十八家，共計五億六千四百餘萬元，新開工業以火柴、黑礮、染料、搪瓷、油類等化學工業為多。舊有工商業增資擴大規模者共一百家，增資六億一千二百餘萬元，其中工業增資七十八家，增加資金五億一千七百餘萬元，佔總增資額八十四%，增資各業中以紡織、皮革、化學製品及皮毛加工業為多。吉林的東建洋灰廠於今年八月一日恢復生產，每日產量達一百三十四噸，與偽滿時期產量相

差無幾；停工四年的安東造紙廠亦於今年八月半開工，大量出產白報紙，鈔票紙及捲煙紙等。鞍山的鋼鐵廠在國民黨破壞之後，亦恢復生產了。牡丹江的製鐵工業與一九四六年年底比較，機器架數增了三倍，使用電力增加了十倍。紡織業一年半以來增加動力二十二倍強，製木材業僅今年一月至四月，動力即增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

解放區的工業建設的巨潮，不但提高了原來工業城市的生產，而且改造了消費城市爲生產城市。例如舊滿時代的牡丹江，原來是一座毒化消費城市，在這兒，充滿着古董、奢侈品及鴉片煙館（約六百餘家）。經過解放三年的建設，現在已成爲一座新興的相當電氣化的生產城市。據今年七月底的調查：全市工商業戶數共四千七百七十七家，其中工業佔四分之一，計有一千二百三十八家，除國營大規模工廠外，五十九家鐵工廠有機器車床共三百三十九台，使用動力達四、六〇六匹馬力，不僅能製造一般機器，而且能製造複什的機器。製木業有二十家，全年可製木材六十萬立方米。紡織業現每月可產布一萬五千疋。化學工業有火柴、松節油、玻璃、膠皮、造紙及製藥等五十七家，在一九四六年，全市用動力電的工業有二百二十家；而今年七月則增至四百四十家，馬力已增加了五倍。經過了三年的努力，牡丹江已在基本上消滅了失業的現象，成爲一個的確的生產城市了。

解放區的工業生產之蓬蓬勃勃的發展，主要是以工人階級積極性之提高和人們改變了勞動觀念作爲根據的。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工人是社會的主人翁，是國家政權的領導者，在私人企業中，工人是處於被剝削的地位的，雖則如此，工人階級爲了長遠的利益，總是興奮地努力工作的。哈爾濱的工

友，於今年二月一日開展了立功運動，在四個月（截至六月底止）中，就克復了一切困難，提高了產量和質量，湧出了大批功臣。電業局的工友，在嚴寒的冬天，爬上十幾米高的電桿上修理電線，凍壞了鼻子仍堅持工作。他們對於材料非常愛惜，連一個掉在雪裡的小螺絲釘，亦要刨出來用。由於全體職工的努力，不但完底了××萬基羅瓦特的發電，而且比偽滿時代的損失率減低了百分之十三。在綫路方面修補了兩萬餘送電線，完成十餘個基羅瓦特以上的變壓器。電車廠在四月份中突擊出了三台車，並創造了一種絕緣油。該廠職工自動建立每月一天「擁軍」日，在「擁軍日」中，工友們一直工作十小時至十二小時以上。青工孫吉祥為完成緊急的修車任務，曾自動地兩晝夜不睡覺，努力工作。由於大家精心愛護，使電機壽命得以延長。過去十幾天要修理一次，現在則可以用到七十幾天才修理。自來水廠亦在立功運動中完成了電氣淨水並使輸水量提高到一萬六千萬多噸。

勞動積極性之提高，不但改善了產品的質量並提高產品的數量，而且不斷地出現了技術上的新創造。哈市鐵路局電氣修築廠工人，於製造電話機時，設法解決原料的困難，軒工組工人樊世元劉春生等，研究用細木代替了膠木。機務段技術室劉士勳等工友，改造了「機車連結捧石鹹油油壺」。

偉大的工人階級，不僅在和平環境中發揮其生產的積極性，而且在解放戰爭中發揮其偉大的作用。和交通工人保護交通工具並迅速恢復交通一樣，煤礦工人努力保護煤礦的設備，並使煤礦生產得以繼續進行。在中國最大的「煤都」撫順，四大礦山與二十個工廠的三萬六千職工，在解放前曾秘密組織「護礦委員會」，提出「保護礦山就是保護我們的生命」等口號，嚴密阻止國民黨軍隊和特務的破

壞。車輛廠職工拆掉車上重要零件，使蔣軍沒法帶走一輛車。發電廠職工除日夜組織看守外，很多工人準備了手榴彈，準備反蔣抗軍的破壞。當解放軍攻入撫順，戰鬥正在進行時，礦工仍繼續工作。著

名全國的豫北焦作煤礦區及自來水公司，發電廠、機器修理廠等，在工人週密保護之下，未受破壞。現該礦正加緊出煤，供應軍需民用。最近淮海戰役中解放的棗莊、賈汪煤礦，亦因受到工人的保護而得以繼續生產。賈汪的礦警被解除了武裝，千餘職工自動組織起來，維持秩序，修置機器物資，照常供水發電。

(四) 交通的恢復

爲了發展農業和工業的生產，交通運輸是必需得到配合的。就是在航空運輸發展到很可觀的階段的今天，鐵道運輸，仍然是貨運客運的主導。在東北，截至本年十一月下旬止，秋季攻勢中所收復的鐵路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完全暢通，其餘若干處正在日夜搶收，加上民主政府兩年中來所添築的新線在內，預計本年底東北全境，路線將達九千公里。所有已暢通的鐵路，不但舒暢地運銷了各地工業品及地方特產，更重要的是直接有力的支援了前線。各線發車時間準確；客運貨運亦日趨改進，其在關內，“以河北省石家莊爲中心，西起山西陽泉，東迄山東德州的陽德鐵路已全線修復通車。陽德鐵路的通車，是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設力量的證明之一。一年來，該路員工，沿線農民及黨政工作人員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以無比的熱情及無窮的創造力，共修復鐵路四百五十四公

里及較大橋樑一百餘座。目前全路員工正在「修到太原去！」「修到氣南去！」的口號下，排除萬難，繼續向東西伸展。」（本年十二月三日新華社電訊）。在修路過程中，鐵路員工表現其高度的覺悟與驚人的努力；中共與民主政府則極端重視工人的安全與福利，用各種辦法防止意外事故發生，做到了沒有一人傷亡，而陽德鐵路局則打破了歷史成規，在「邊修邊運，開展營業」的正確方針下，做到了「以路養路，以路修路」。本年一月五日起即分段營業，迄七月七日全線通車。九個月中，以運費收入補助修路費用和員工薪資開支，從六月份起即達到自給自足的境地。鐵路之外，各處公路亦在搶修中，今年秋季新解放的地區大部份已暢通無阻了。鐵路與公路之暢通使東北，使華北與山東的物資流通更加順暢，從而使華北與華東解放區的工農業生產，獲得更進一步的發展。

交通運輸的擴展是解放區工商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貨幣的統一更是解放區工商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華北、山東、晉綏與陝甘寧各解放區政府於今年十二月一日協商，成立中國人民銀行並發行統一的新幣，規定新幣一元合冀南幣或北海幣一百元，合晉冀察邊幣一千元，合西北農幣二千元，新幣首先在華北、山東、西北各解放區流通，逐漸擴及其他解放區。新幣之發行克復了過去幣制不統一、幣值比價不固定、從而成爲發展生產貿易的巨大障礙。更進一步來說，人民銀行的成立與新幣的發行，不但便利於解放區經濟的發展，而且亦爲將來全國性的民主聯合政府奠定了一個基礎。

(五) 幣制的統一

解放區的統一幣制，與蔣朝的所謂「改革幣制」絲毫沒有類似之點，蔣朝的所謂「改革幣制」，目的是爲了實行更劇烈的通貨膨脹，並以此來殘酷地掠奪人民，故其結果，不但物價飛漲，民怨沸騰，而且更加速了經濟的崩潰。解放區的改革幣制，是爲了使貨幣制度更簡單，更鞏固，是爲了更便利於物資交流和經濟發展。這完全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有人擔心戰事未結束，財政支出不免增加，因而就會影響到通貨的發行上來。殊不知，解放區的新幣是建築在發展的工農生產事業之上，是建築在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之上的。看看解放區各銀行的放款集中在農貸工貸的事實，看看農民在豐收後踊躍的提早的繳納公糧的事實，就可以看出新幣的社會基礎，是何等鞏固了。

配合着軍事的巨大勝利，解放區的經濟亦在大步地前進着，從農業到工業，從金融到運輸，都在飛快地進展着。在農村，由於「土改」的關係，黑暗的中世紀剝削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是個體的農民經濟，是公營農莊，是新富農經濟，是資本家投資經營的農場。在城市，由於發展生產公私兼顧的政策之實行，不但公營企業飛快地在擴展着，而且私人企業亦飛快地在擴展着；由於繁榮經濟勞資兩利的政策之實行，勞動階級不但在公營企業中發揮其無比的積極性創造性，就是在私人企業中，他們亦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原則之下，興奮地爲爭取提高質量增加產量和減低成本的實現而努力！

解放區正在大踏步前進；解放區正瀰漫着奔騰澎湃的生產運動。新的中國經濟正在奠下它的發展的根基。中國人民在翻身；中國的經濟正在改變其面貌！

四 爲建設新中國而努力

跟着人民解放軍的飛快的勝利，跟着解放區領域的急速擴大，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快要成爲中國經濟的主體了。爲了迎接這個嶄新的充滿着朝氣的新中國，我們希望：

(一) 蔣區中的工人與職員，要學習撫順和焦作煤礦區職工的樣子，要學習交通工人保護交通工具並迅速恢復交通一樣，用盡一切辦法去保存各企業中的設備。保護了設備，就是爲國家民族多保留一分元氣；就是爲新中國的生產建設減少一分困難。

(二) 蔣區中的民族工商業家，要看穿蔣朝的無恥造謠，要拒絕蔣朝的無理威脅，鎮靜地把物資和生財保存起來，作爲明天發展生產的底子。逃，難道是辦法嗎？四大家族及其高級走狗，因爲榨取了巨量人民的血液，有財產存在北美和南美，可以渡其優閒的生活。你們能够這樣嗎？你們願意作毫無前途的「白華」嗎？人民在向你們招手；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在向你們招手！來吧，來共同建設新中國吧！

(三) 香港和海外的僑胞們，中國翻身了；國民黨給予你們的無理壓迫，如今一掃而空了。新的中國將保障你們企業的發展，將使你們獲得一個美好的投資場所，將使你們獲得一個巨大的銷貨市場。祖國舉起雙手，在向你們呼喚，在希望你們來開闢，來建設中華民族的樂園。

(四) 散在海內外的經濟學者和技術專家，過去的中國，過去在帝國主義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統

治下的中國，不知扼殺了多少人材。讀了書，學了技術，都是不得其用的。現在，時候到了。人民需要你們的學問；需要你們的技術。作為經濟學者和技術專家的朋友們是再亦不能在書本子中兜圈子，再也不能在原稿紙上寫空論了。要精通一件業務，要把學問和技術與人民生活結合的工作，是刻不容緩了。

舊中國在死滅，新中國在前進！我們要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為建設新中國而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七 論新中國的工商業家

跟着人民解放軍的偉大勝利，跟着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的實施擴展，中國經濟正在深刻地改變它的面貌，中國人民正在劇烈地打碎百餘年來鎖在身上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鐵鍊！

舊的中國快要斷氣了；新的中國，正如東昇的太陽一般，金光四射地在邁步前進着！新的中國，不是別的，乃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民中最廣大成份的要求的國家制度——新民主主義制度。

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中，不但農民有田可耕，不但工人有工可做。而且，那些向來被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所壓迫與損害的中小資產階級——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亦獲得其發展的機會。

由於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長期搾取，由於國內戰爭與八年抗戰的長期破壞，落後的中國經濟就變得更加落後了。要使中國經濟從破壞的廢墟中壯健起來，第一句話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第二句第三句話還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爲了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我們必須動員一切人力財力，必須使國家經濟有巨大的發展，必須使合作經濟有廣泛的發展。同時，亦必須讓那些有益於國民經濟的私人資本，有一個發展。由此可見，保護工商業這一經濟綱領，絕對不是一種外交辭令，而是一種基於客觀需要的基本政策。

解放區民主政府的措施，處處是有利於工商業之發展。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使廣大的農民從殘酷

的封建剝削中解放出來，使廣大的農民，大大地提高其生產情緒與對於商品的購買力，從而解決了工商業家的市場問題與原料問題。其次解放區的合理的稅收政策，取銷了國民黨的苛捐什稅，取消了五步一卡十步一關的中世紀式的虐政，從而大大地減輕了工商業家的負擔，並便利於農產品與工業品的流轉。再其次，解放區民主政府執行勞資兩利的政策，減少了勞資間一些不必要的磨擦，基本上取消了罷工怠工等等不利於生產的現象，從而使民間工商業的發展，使民間企業的資金積累，得到長足的進步。除此之外，民主政府並且在資金上，在運輸上，在原料的供應上，又不斷地給予工商業家以切實的扶助，從而使民間企業日新月異地擴大其生產規模和營業規模。

在新民主主義國家中，工商業家是會被人重視的，是會獲得其順暢的發展條件的，但，在這裏，我們却不能得到這樣的結論，說工商業家的一切，會無條件地被人重視，會無條件地被新中國所接受下來。

今天中國的工商業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產生和長大起來的。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工商業家是難免不帶着買辦性和封建性的。直接為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服務並和農村中的半封建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大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其買辦性與封建性之顯著，固不用說；就是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中小資本，亦不是完全和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絕緣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方面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有矛盾；另一方面又同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並未完全斷絕經濟上的聯系。民族資產階級的某種程度的買辦性與封建性，顯然是不會為新中國所接受的。

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不容許有封建剝削存在的，農村中封建的土地制度與封建的高利盤剝，一掃而空了；在城市中，那種剝削平民的印子錢和典當，是在禁止之列的；那種侵蝕買賣雙方的商業組織如牙行及經紀行之類，是必須加以取締和改造的。

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不容許買辦經濟關係之存在的。買辦資本直接為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服務並為後者所豢養，買辦資本家乃是黃皮膚的外國人。買辦資本援拾帝國主義外國資本掠奪自中國人民的血肉的餘唾。買辦的經濟關係存在一天，就一天表示中國的國民經濟還沒有獨立自主。新的中國自然不許這種關係存在。在這裏，或許有人以為反對買辦關係會影響到國際貿易。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反對買辦的經濟關係並不等於取消國際貿易。新中國是並不會取消國際貿易的。為了國際貿易自然需要一些人去與外國資本發生關係，但是，在新中國中從事於國際貿易中的商人，應該站在中國國家民族的立場，而不應該站在外國資本的立場，這難道還有什麼疑義嗎？

對於工商業家的這種弱點，應該採取改造和克服的態度。譬如當典停止之後，當典業的老板雖然不能再向貧民進行封建性的榨取，但民主政府可以讓他的資金轉移到一些有利於國民經濟的部門去投資。譬如牙行及經紀行取消之後，原來經營牙行和經紀的商人，可以轉業做別種生意，或者從事新式的交易所的業務。東北有一個牡丹江市，在偽滿時代，是一個著名的毒化消費城市，在那兒，充滿着古董、奢侈品及鴉片館館，單單鴉片就有六百家，解放之後經過民主政府二年的努力鴉片烟鬼被改造了，鴉片館被淘汰了，古董店及奢侈品亦一月比一月的減少下去，到今天，牡丹江市完全改變了本來

面目，變成一座新興的電氣化的生產城市。環境在變，人民在變，工商業和工商業家怎能依然不變呢？

那末，新中國所希望於工商業家的是什麼呢？

第一，新中國並不反對工商業家賺錢，但是，他們的錢，應該從致力於生產事業或正當的貿易運輸而獲得，斷不應從囤積居奇，從壟斷操縱，從破壞國家法令和破壞市場安全而獲得的。更明確的說，新中國的工商業家應該以有益於國民經濟的業務為業務，應該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為前提。

第二，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國家經濟，由個體逐步地向着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和私人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裏，國家經濟是領導的成份。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是以公私兼顧為重要原則之一的。國家經濟在它的措施上，處處要照顧到私人資本；但在另一方面，私人資本亦應誠心誠意地接受國家經濟的領導。與國家經濟取得密切的配合。這就是，凡是國家所鼓勵獎勵的部門，工商業家就應該踴躍投資；凡是不被國家所鼓勵所倡導的部門，工商業家，就應該削減其投資或停止其投資。

第三，「勞資兩利」是新民主主義的人民處理勞資關係的基本方針，所謂「兩利」，就是說，為要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必須同時兼顧勞資雙方的利益，而不能只顧勞資任何一方面不顧對方的利益。因此，過分強調工人的暫時利益而忽視資方利益，致使資方無利可圖，那是錯誤的；同樣，片面強調資方利益，違犯法紀，侵犯工人的法定權，那亦是違反勞資兩利的方針的。故開明的工商業家必須處處以「勞資兩利」為前提，切實地執行勞資兩利的方針。

第四、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但是工人和農民的福音，而且是工商業家的福音。一如上面所說，

新民主主義制度是發展中國經濟的暖花房；服從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法令，歸根到底，亦就是爲着工商業家自己的利益。因此新中國的工商業家必須以服從法令。忠實納稅以至踴躍認銷公債等等，作爲特點之一。

新中國所求於工商業家者很多，這兒所說，不過是一些比較基本的特點而已。

新的中國需要新的工商業，需要新的工商業家。新的環境將會產生出這樣有益於國民經濟的工商業家，那是可以斷言的，不過眼光遠大的工商業家是不應被動地被淘汰，而是應該在提高自己改造自己的努力中，爭取在新中國中光榮的地位的！

第八 中國經濟學人今後努力的方向

跟着人民解放軍的飛快勝利，跟着解放區領域的急速擴大，跟着土地改革與各項發展生產的政策之實施，新民主主義經濟快要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了。面對着這個嶄新的局面，中國的經濟學人將如何工作呢？

當國民黨的統治區域還維持其優勢的時候，中國經濟學人的眼光，一般是射在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壤之上的。在那個時候，大家用較多的精力，去研究國民黨貨幣政策，去批評國民黨的財政政策和管制政策，去揭露國民黨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掠奪性與破壞性，去揭露美帝國主義如何使用牠的工具來侵略中國，如何在金融財政上，如何在產業與貿易上，獨占了中國。這種工作，分明是必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揭露，才能使中國的人民認識蔣介石政權的性質，才能使中國的人民更加加強其反美反蔣的決心。反動的統治如果一天還存在的話，那怕牠只擺了一個小攤子，這種工作，還是不應該放鬆的。

可是，如果從全國的形勢來看，這種揭露的工作，在比重上，分明是比以前來得降低的。大半個中國，今天不復在美蔣的鐵蹄之下呻吟了。這大半個中國的人民，今天正像一股排山倒海的巨浪，在農村中進行着奔騰澎湃的生產運動；在城市中，正在進行着轟轟烈烈的發展工商業的運動。毛澤東同

志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顾、勞資兩利」的國民經濟指導方針，已經掌握了羣衆，已經成爲不可抗拒的物質力量了。面對着這個波瀾壯闊的經濟建設，那種揭露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自然而然就要成爲次要的了。因此，中國經濟學人今後的努力，如果只對反動統治區域作嚴謹的批評，分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對於解放區的生產建設要作切實的建議。

最近香港的經濟學界，對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曾做過一番探討。這無疑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因爲，對於新民主主義經濟有正確的認識，自然大有助於新的財政經濟政策之實施，大有助於中國人民對於新政權的認識與擁護，但是，我們的探討似不應該停留在這裏。要對於新民主主義經濟有正確的認識，斷不是從抽象的理論所能達到的。這就是說，如果沒有從各種實際問題去着手，如果沒有從具體的問題去分析公私和勞資的關係，則我們對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了解，是沒法得到正確的觀念的。

如果老是停留在概念的理解上，如果只在不切實際的「理論」（指那些脫離實際的「理論」）下工夫，則我們將會陷於學院式的戲法之中而不能自拔了。蘇聯經濟學界最近的動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據電通社莫斯科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訊，「蘇聯的政治經濟學家們，正在號召研究如何把社會主義經濟學實際地應用於目前的情況，以幫助蘇聯政府及人民民主國家的政府。這是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科學委員會最近召開的四天會議討論的主要內容。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奧斯特洛維揚諾夫提醒蘇聯的四千五百個經濟學家說：聯共中央最近號召哲學家和生物學家少作空泛的理論，加強實際效果。」

經濟學家們也應當從這一號召中得出同樣結論。會議通過明年（即今年——引者）的計畫，其中包括對下列問題的研究：蘇聯工業中的工資問題，電氣化在完成向共產主義轉變的過程中的作用及對開發東部西伯利亞的展望等等。蘇聯經濟學界這種努力的方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應該在自己的崗位上，對於新中國的建設，要有鮮明的貢獻！

那末，我們要怎樣努力呢？

第一是致力於各項調查研究的工作。不了解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是沒法決定政策的。毛澤東同志說得好：「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試想想吧，如果對於中國的實際情況，只知道一個輪廓；如果對於中國經濟，只是一知半解，就誇誇其談的發表其妙論，這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有什麼好處呢？當然是沒有的；不但沒有好處，却反會貽悞天下蒼生。又是毛澤東同志的話說得對：「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的妄說。」我們如果不要作無知的妄說，就應該實實在在地做些調查研究。

第二，調查研究並不在於玩弄數目字，而是要從具體的分析中，去把握中國經濟的規律性；並根據這些規律性去找出合理的辦法來。舉個例子來說，從封建制度解放出來的龐大農民的個體經濟，如果不使他們走向合作社，那末，農業經濟是難得發展的。但，要使農民加入合作社，斷非一紙法令所能奏效，我們對於農民的個體經濟必須有明確的了解，只有了解他們，才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在香港，要找得這種材料，分明是困難的，但，華商工商業家方面的問題，何嘗不可做我們研究的對象？

第三，從個人來說，調查研究並不是漫無邊際的，而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實實在在地要為中國人

民解決問題，因此作為一個中國的經濟學人，就應該具體地調查某一個具體問題，研究這一項具體問題，掌握這一個具體問題的來龍去脈，對這個具體問題提出實實在在的辦法。空洞不切實際的泛論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或許有人以為身居香港，難於找到調研的對象吧，其實，這是一種遁詞。問題的本質不在於是否找到調研的對象，而是在於是否下了決心作具體的調查研究。

第四，調查研究是今後工作的一方面，但同時我們自不能忽略對於整個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學習與掌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與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是已經規好了的；財政經濟的各項政策亦正在討論與訂定之中。中國經濟學人的任務就是在於根據這些綱領方針和政策，去研究各項具體問題，去促進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建設。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與國民經濟指導方針，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具體實踐的結合。因此如果不了解中國的具體條件而圖圖地把東南歐各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情況硬搬過來，或者根據東南歐的材料就替中國經濟做出結論，那是難免不錯誤的，只有掌握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基本精神，只有把這種綱領和方針與調查研究結合起來，纔能在實踐中對新民主主義的建設，有所貢獻。

這是作者個人對於中國經濟學人今後努力方向的意見，錯誤或不遇到的地方，一定是有。甚望各方賢達，有以教之。

後記

本書有幾篇文章，原是編在「新民主主義與中國經濟」中的。「新民主主義與中國經濟」再版的時候，新民主出版社的負責人問我對於這件事的意見，考慮之後，覺得局面發展太快了，有許多問題原書是沒有提到的。因此，決定加以重編，只有「耕者有其田是發展工商業的前提」「消滅壟斷資本與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及「城市經濟改造」三篇保留下來。同時，因為內容的成份變化了，書名亦不得不加以更改。

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之勝利，是鐵定的了；民族工商業家之獲得發展，亦是鐵定的了。但是，還有不少人在發生懷疑。懷疑新中國是否有他的份兒，懷疑新中國是否能給他一個發展的機會。這是一方面；同時，在另一方面，却有一些人把保護工商業當作一種先天的權利。對於工商業家在新中國的任務，對於工商業家本身應如何改造等問題，沒有弄得清楚。這兩種觀念都是對新中國與族工商業家有害的。

作者在這本書裏，除了說明中國經濟改造與民族工商業家之關係以外，還在一定程度以內，稍為提一提民族工商業家應如何改造自己。這都是作者個人的管見，錯誤當然是有的。這只有請經濟界諸先進來指教了。

作者 三十八年三月廿八日

1號角 國的指針！ 民 義 論

毛澤東著 價九角

-一九四〇年先生寫的文章，現在
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基本上是相同的中國不是別的國家。這和孫中山先
三大政策不同的嗎？每個關心中國局勢
子地研究。

重新校正 版出書

七四九一 共國中 文要重

件，都是整個革命戰爭中的軍事、政治、
年來中共的重要文
這裏集合了歷
走進決定勝利的一
解放軍由全面反攻
人民解放軍由防禦
一九四八年是人民
轉入進攻的一年，



★本社最近出版及總經售新書★

-
- 人民公敵蔣介石 陳伯達
-
- 美蔣陰謀秘聞 鄭汝楫
-
- 怎樣作工作總結 洪彥林
-
- 論布爾什維克
成功的基本條件（增訂本）
-
-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劉少奇
-
- 工商業家的出路 許蓀新
-
- 新民主主義工商政策 毛澤東等
-
- 中國土地改革問題（增訂本） 孟南
-
-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孔厥
-
- 從一個村看
解放區的文化建設 白桃等

國的號角

新民主

毛澤東著

這是一九四〇年毛澤東先生已成爲建設新中國的中家，而是「新民主主義」的生革命的、三大政策的。但也有不同的。每個人們好好地研究。

重新校

中國婦女大翻身

件，都是整個革命戰爭中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方針總策略，方便於一關心革命現勢的人們參考與研究。

· 每冊定價港幣二元 ·

中國的婦女過去幾千年來都是受難最深壓迫最重的。她們在男性中心的封建社會裏，連做人的起碼權利都可以被剝削擗盡；她們可以被踐踏被當作商品出賣而申冤無處。

然而人民自己的國家，經過全國人民長期艱苦的奮鬥建立起來了！這裏不但沒有壓迫婦女的事，反而鼓勵幫助婦女打破封建的枷鎖得到完全的解放！在解放區的法律上男女的權利是完全平等的，在公營機關的婦女幹部，生育兒女的時候，更可以得到特殊的優待。

在解放區，多少以前的童養媳、奴婢、被出賣的婦女……今天成爲爲人民立功的女英雄！連妓女也被改造成勞動生產的戰士！中國婦女要大翻身了！

新民主出版社發行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